

馬來西亞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新冠疫情：  
《星洲日報》與《星報》之比較

How does the Malaysia'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in COVID-related News? Comparison of  
Mandarin media “Sin Chew Daily” and English  
media “The Star”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周洳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馮垂華

Ru-Xuan Chew  
(Master of Arts Stud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wei-Hwa Hong  
(PhD Stud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How does the Malaysia's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in COVID-related News? Comparison of Mandarin media “Sin Chew Daily” and English media “The Star”

Ru-Xuan Chew

(Master of Arts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Chwei-Hwa Ho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 Abstract

In late 2019, an outbreak broke out in Wuhan, China, and quickly swept the world. The pandemic posed an enormous challenge to China's national image, forcing the country to reshape its image through mechanisms of transnational media influence. Prior studies show that Malaysia's media is one of the targets of China's influence.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mechanisms of media influence rather than on how these media present China's imag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how China's image is presented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language media, Sin Chew Daily, and the English-language media, The Star, in order to examine how China's image is presented in both newspapers. Do the images presented by different linguistic media vary depending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facto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China tyco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at own Sin Chew Daily and The Star, respective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We used a web crawler to crawl data from Sin Chew Daily and The Star newspaper to collate media reports on the China epidemic between 31 December 2019 and 31 December 2021 and to analyze and critically discuss the content of the outbreak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issues involved (image of healthcare and its controversies, information control, personal freedom control,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content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search and think tanks have often categorized Sin Chew Daily and The Star as "pro-China" media. This paper finds, however, that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focus on the various controversies in the incident, and even individual media attention and content are pretty diverse in their presentation of diverse controversial issues. Thr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finds that when Sin Chew Daily presents its content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its discourse works through favorable rhetorical terms regarding emotions, morals, and rights by reproducing or rationalizing ideological presen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r, as an English-language medium, is ideologically biased towards Western values, such as reporting on concepts such as human rights, universal values, and civil society.

**Keywords:** Media Representation,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ent Analysis, Frame Analysis, Malaysia

# 馬來西亞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新冠疫情： 《星洲日報》與《星報》之比較

周涵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馮垂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

## 摘要

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疫情，並迅速席捲全球。這場疫情對中國國家形象造成巨大挑戰，迫使中國透過跨國媒體影響機制來重塑自身形象。過去研究顯示，馬來西亞媒體是中國的影響對象之一，不過，這些研究多聚焦於媒體影響機制，較少討論這些媒體如何呈現中國形象。因此，本研究將以馬來西亞中文媒體《星洲日報》以及英文媒體《星報》（The Star）為研究對象，分別觀察兩大報章所呈現之中國疫情相關內容，探討不同媒體如何呈現中國形象？不同語言媒體所呈現的形象是否又因文化、語言等因素而有所差異？

本文的研究個案《星洲日報》及《星報》的所有機構分別為親中商團及政黨，控制了組織網絡的影響力後，得以檢視兩者的差異。我們以網路爬蟲（web crawler）的方式對《星洲日報》及《星報》進行資料爬取，整理出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間有關中國疫情內容的媒體報導，並依疫情事件中爭議議題類型（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資訊控制爭議、人身自由控制爭議、病毒起源爭議）來進行內容分析與批判論述分析。

過去文獻與智庫常將《星洲日報》及《星報》列為視為「親中」媒體。但本文發現，不同媒體對事件中的各類爭議均有不同的關注程度，甚至個別媒體對各類爭議性議題的呈現也相當多元。本文推測，這與媒體組織與中國依賴程度、文化價值觀有關係。

另外，透過批判論述分析，本研究發現《星洲日報》不管以正面或負面方式呈現內容時，其論述操作均用情感、道德和權利層面的正向修辭詞彙，再製或合理化意識形態展現。相對的，《星報》的意識形態偏向西方價值觀，如透露出較重視人權價值和公民社會的態度。

**關鍵詞：**媒體再現、新冠肺炎、內容分析、批判論述分析、馬來西亞

## 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疫情，並迅速席捲全球。這場疫情對中國國家形象造成巨大挑戰，迫使中國透過跨國媒體影響機制來重塑自身形象。過去研究顯示，馬來西亞媒體是中國影響對象之一。不過，這些研究多聚焦於媒體影響機制，較少討論這些媒體如何呈現中國形象。因此，本研究將以馬來西亞中文媒體《星洲日報》以及英文媒體《星報》（The Star）作為研究對象，分別觀察兩大報章所呈現之中國疫情相關內容，探討不同媒體如何呈現中國形象？不同語言媒體所呈現的形象是否又因語言而有意識形態的差異？

事實上，中國從來不掩蓋它影響世界媒體風向的意圖。2013年，剛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中國對外宣傳指導方針，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時隔年餘，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在「2015年第四屆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再度提到「講好中國故事」。他鼓勵海外華僑善用媒體、組織、社團等機制，進行海外宣傳工作：<sup>1</sup>

發揮廣大華僑華人的獨特作用。廣大海外僑胞，特別是海外的僑團、僑社、僑媒，僅華文媒體就有1000多家，具有跨文化、跨國界的特殊地位、綜合實力和人脈網絡，他們在報導新聞、傳播中華文化和溝通中外思想的時候有獨特的優勢。隨著華僑華人在海外地位的提升，族群意識的覺醒，他們有意願也有能力匯聚力量，為推動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促進中國的傳播能力建設，維護和促進中國的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澳洲學者 Hamilton (2019, 43) 認為何亞非這段話彰顯中國「全球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何亞非：發揮華僑傳播中華文化優勢〉，網址：<http://www.scio.gov.cn/m/zhzc/10/Document/1437648/1437648.htm>。查閱時間：2019年12月7日。

稱霸」的野心，暴露欲利用海外華人發揮國際傳播影響力的企圖。實際上，隨著中國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力量的崛起，國際社會越來越擔心中國威權政體對民主和人權，包括媒體的獨立性及自主程度產生潛在影響。近年來，馬來西亞媒體的獨立性也一直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及挑戰。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於2022年4月25日發布的「中國影響力標準」，在36個評估國家中，馬來西亞排名第8，媒體被影響的機率更高達45.5%。<sup>2</sup> 這使得馬來西亞媒體成為中國政府或官媒的「傳聲筒」，協助對外形塑「中國形象」。

過去的研究多聚焦在馬來西亞中文媒體所受到的中國影響，並且著重於探討中國政府如何透過代理人機制影響媒體內容的呈現。以《星洲日報》為例，其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即強調報業只有在「中華民族覺醒得依賴中國世界經濟市場的開發」上才能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使命，成功讓讀者將自身的族群想像投射到中國經濟市場（黃招勤 2011），形塑另類的中國認同。莊迪澎（2013）也指出，1991年至2010年間，張曉卿與《星洲日報》積極推廣「文化中國」的宣傳，其論述框架基本強調華人文化的重要性，但進一步淡化中國在政治議題上的敏感性。這種弱政治、重文化的論述框架，掩蓋了中國政府在世界或區域範圍內真正的政治意圖，繼而引導讀者支持。

另一方面，媒體也常因經濟依賴、外交關係、政治脅迫或誘導，以及文化情感而對中國敏感話題進行自我審查（房翠瑩 2016; Huang 2020）。例如，馬來西亞《詩華日報》母公司 K Multimedia Sdn. Bhd.

---

2. 評估標準為：馬來西亞媒體有參與「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組織機構」、「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中國全費用付費媒體之旅、曾接受中國官媒或與中國有關的實體培訓、中國官媒（包括印刷、廣播和影片）以當地語言進行廣播或分發、有中國公民或公司全部或部分擁有地方媒體機構、有些媒體發布了中國官媒提供的廉價或免費內容；有記者受到中國釋出的壓力，包括（但不限於）公開譴責、吊銷記者身分證、拒發簽證；當媒體批評中國政府觀點事件時，遭到審查；有媒體人士（包括記者或評論員）或名人否認中國存在侵犯人權行為（例如媒體懷疑新疆存在維吾爾人再教育營）。資料來源：台灣民主實驗，2021，〈馬來西亞中國影響力標準〉網址：<https://china-index.io/country/Malaysia>。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應中國總領事館要求，刻意在新聞內容中避免將「中港台」名字並列，改寫成「中國（包括台灣與香港）」形式。<sup>3</sup> 另一方面，《星洲日報》和馬來文報《陽光日報》（Sinar Harian）<sup>4</sup> 的編輯部高層更是分別受邀參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喀什市疏勒縣教培中心。參訪結束後，《星洲日報》隨即刊登了《新疆教培中心曝光 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的「宣導式」報導，主要依循中國官方態度描述新疆教培中心，強調中心狀況不如西方媒體所述的惡劣、違反人權，或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權利。<sup>5</sup>

前述研究或事例具體呈現中國對馬來西亞媒體的影響機制，有助於我們從代理人模式理解中國如何影響馬來西亞媒體運作。這些代理人包括企業主、媒體集團擁有者、政黨及政治人物等等。不過，前述討論仍有幾處留白待補：首先，馬來西亞媒體「中國因素」的研究多以中文媒體作為分析個案，缺乏不同語言媒體之比較，尤其在中國政府同時積極影響非中文媒體的情況下，比較不同語言之媒體遂有其急迫性；其次，這些研究對了解媒體的「委託—代理」模式有豐富的貢獻，但很少對媒體呈現的內容進行追蹤分析，無法讓我們深入理解它們如何呈現、呈現了何種「中國」。本研究因此認為，要理解中國對大馬媒體的影響力，除了探討單一中文報章之外，還必須理解其他語言報章的意識形態，以釐清中國因素中是否存在文化及語言差異。

在此題旨之下，本研究參考過去的調查報告及學術研究後，將中國對媒體的影響機制作為研究背景，而非本文之討論主題。相反地，本研究將著重討論不同語言媒體所呈現的內容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應該

---

3. 陳芳伶，〈中共竟要求馬國媒體寫「中國包括台灣香港」？網友：「回家吧，馬馬」〉，新頭殼Newtalk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1-15/327419>。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4. China Daily. 2019. “Indonesian, Malaysian journalists visit Xinjiang” 網址：<https://reurl.cc/V1qy1A>。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5. 朱運健，〈新疆教培中心曝光 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星洲日報》網址：<https://reurl.cc/kEQGL9>。查閱時間：2019年12月7日。

如何選擇有效的比較個案，以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擾？本研究認為，這些個案至少必須同時具有相似的「中國因素」背景，並且都針對同一事件發表相關內容。為此，本研究選擇馬來西亞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媒體《星洲日報》和最多發行量與讀者人數的英文媒體《星報》<sup>6</sup>為研究對象，分析這兩家媒體如何呈現中國當地極富爭議的Covid-19疫情。這場瘟疫始於中國武漢，並長期被認為發源於中國當地，在疫情最初，中國更遭傳隱瞞疫情、限制人身自由或控制媒體、網路資訊等事件而受國際社會批判。當此之際，中國更需要仰賴國際媒體來形塑自身形象，因此分析疫情期間的媒體內容，有助於凸顯中國形象的轉換。

就媒體「中國因素」的背景而言，《星洲日報》所屬機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董事會主席長期投資中國，也會在新聞事件如「反送中」課題上清楚表明中國立場與示威者的負面指控。《星報》則由「馬華公會」所擁有，艾利艾智庫研究發現，其會定期討好中共（黃國富2021；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19）。本研究控制了馬來西亞媒體集團組織的「中國因素」背景後，嘗試檢視不同報導語言的媒體所呈現的中國形象是否有差異。

在分析議題上，本研究將以疫情間之關鍵事件作為分析節點，觀察兩大報對中國疫情報導的論述類型，其如何呈現中國形象？兩大報章對疫情間不同議題的關注程度是否有所差異？它們是否有偏好何種議題，且有特定的立場？又如何透過論述方式呈現該關切議題，論述方式是否有意識形態的箝入？最後，不同語言的媒體敘事差異能否說明特定語言文化傾向於中國認同？本研究將結合內容分析及批判論述分析，以回答上述研究提問。

---

6. adQrate, n.d., “The Star circulation and readership” 網址：<https://reurl.cc/3YpevO>。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 貳、文獻回顧

### 一、國際政治傳播及病毒政治化

從字面意義上看，國際政治傳播指國際關係的政治傳播。為了有效了解國際政治傳播，有必要先了解政治傳播的意義。Mc Nair (2011, 12-14) 在其著作《政治傳播學》(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一書中提到，政治傳播指的是與政治有關的傳播，包括政治人物和政治行為者為達到特定目的所採取的各種傳播形式，選民和專欄作家等非政治人物對政治人物所做的傳播，以及媒體針對政治人物和活動的報導、評論等等。換句話說，大眾傳播在此扮演著傳輸者 (transmitters) 和傳送者 (sender) 的角色，一方面可以讓政治訴求、政綱、廣宣等在媒體上流通，一方面也可以透過報導、社論、評論、分析等方式，將不同的政治資訊傳達給閱聽群眾。

國際政治傳播與一般國際傳播的差別在於，它特別關注政治領域的資訊如何進行跨國互動。其中，國家／政府作為國際政治傳播的重要主體，其跨國傳播行為、傳播意識、傳播策略、傳播效果等因素都是學界研究的傳統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政府的跨國傳播行為往往是有意為之的「有意傳播」，以達成明確的政治目的 (彭懷恩 2015, 301)。此外，國家／政府的國際傳播策略也漸趨多元，並透過許多間接管道來傳播對自身有利的政治訊息。例如，中國就透過各種經濟激勵措施和威脅來增加其對台灣媒體的收編能力，導致台灣媒體自我審查和報導有利於中國的新聞 (Huang 2017)；在疫情期間，中國為了控制自身形象，也透過臉書廣告來傳播疫情訊息，其中包含錯誤訊息和陰謀論 (Molter and DiResta 2020)。這些例子顯示中國不需要完全仰賴官方媒體來進行跨國資訊傳播，相反地，他們有效地利用他國媒體以及新興的全球化網路媒介來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

另一方面，國際政治傳播又可以簡單歸納成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以及國際媒介事件（global media events）兩類重要活動（彭懷恩 2015）。透過分析國際政治傳播活動的內涵，我們可以理解政治傳播所欲達到的目的。首先，公共外交指的是一種利用軟性又隱蔽的方式，將資訊傳給國外受眾的政治傳播活動。這種傳播方式講究親和力，容易為大部分公眾所接受，有助於強化國際傳播主體的國際形象，深化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中國透過奧運向世界傳達新經濟大國希望和平、和諧的訊息，經營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黃藹岑 2009）。不過，隨著中國威權體制漸趨穩定，這種「軟實力」（soft power）的宣傳方式也幫助它提升國家聲望、推廣威權價值觀（Nathan 2015, 156-168）。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動試圖影響大眾意見，創造大批內容需求者，促使當地媒體產出更多他們期待的相關報導（彭懷恩 2015）。就此而言，國際政治傳播的公共外交活動不僅希望達成國際交流、促進國與國關係的目的，它同時還形塑閱聽大眾的認知，爭取國際社群的認同，甚至培養境外的支持群體。換句話說，受影響的境外大眾儘管沒有中國國籍，卻也可能因此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堅定的支持者。

接著，全球媒介事件（global media events）指的是媒體針對一事件或資訊的呈現、再現或重製。作為媒介事件，它必須發生在特定時空，並具有特定的參與者；不過，一個媒介事件若是「全球的」，則意味著它利用新興的媒體技術，克服了時間及空間限制，同時指涉了更廣泛（超越國界）的參與者，甚至令不在場的閱聽大眾「身臨其境」（Rowe 2020）。全球媒介事件包括突發事件，如天災、病毒擴散、恐襲、戰爭等等。這些事件影響範圍廣泛且往往擁有特定明確的受害群眾，可能對事發國家的形象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備受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響未必總是給國家／政府帶來負面效果。彭懷恩（2015）即點出，由於在資訊社會中，人們對國外的建構有賴於媒體所描繪的，並

非根據實地考察，因此全球媒體事件給予該國家一個報導、形塑國家形象的機會。這些事件及相應的資訊影響力巨大，誘發全球媒體都緊迫報導和關注，從而把一個發生在某一地方的事件，放大成全球事件。一個國家可以透過全球媒介事件，調整其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操控政治利益、變動事件的重要性等，吸引各國對此國家的矚目，達到國際宣傳、加強國際形象的效果。

全球媒介事件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機會。影響範圍廣泛的重大事件可能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國際媒體對該事件的再現或詮釋可能對事發國形成批判或抵制。面對這種狀況時，事發國家必須妥善利用媒體技術，引導國際社會態度，甚至展開反制。就此而言，媒體間的互動必然鑲嵌在更鉅觀的國際權力關係之中，它們所呈現的內容因此是國家角力下的結果、政治權力互動的符號刻痕。換句話說，這些內容可以視為一種政治化內容。將視角拉到疫情肆虐的時代，從病毒發源到擴散、國家的因應措施，以及民間態度都難脫政治影響。如西班牙流感、艾滋病、伊波拉病毒等議題皆被政治化，疾病和對疾病的反應被政治化。想當然耳，也會有政治後果。<sup>7</sup> 在此之際，媒體除了作為監督國家抗疫的重要機構，也成為重要的政治宣傳工具，一方面為國家宣導因應的政策及政績，另一方面也協助國家免除應付的責任。

從2019年末至今，對中國乃至全世界來說，新冠肺炎帶給了人們巨大影響，也是本世紀前所未見的疾速傳播病毒。病毒很快襲擾中國及世界各地，國家成為控制災難的主要機構，且由於病毒最初在中國武漢

---

7. Scott, Calloway, “The Ebola outbreak was political — just like every disease outbreak” The Verge.網址：<https://www.theverge.com/2014/12/30/7466989/the-ebola-outbreak-was-political-just-like-every-disease-outbreak>。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Qiu, L., “Fingerprints of Russian disinformation: from AIDS to fake news” The New York Times.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2/us/politics/russian-disinformation-aids-fake-news.html>。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Cotter, C., “From the ‘Spanish Flu’ to COVID-19: lessons from the 1918 pandemic and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網址：<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20/04/23/spanish-flu-covid-19-1918-pandemic-first-world-war/>。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被發現，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也被質疑未積極公開資訊，最終引發國際社會質疑。面對這種狀況，中國政府必須仰賴媒體實施疫情期間的社會控制，也必須對內、對外重新形塑自身形象。面對國內群眾時，中國不同層級政府採取不同的媒體溝通策略，地方政府尤其著重在傳播指導型（*instructing information*）以及調整型資訊（*adjusting information*），中央政府則傾向傳播倡導型（*advocacy information*）以及支持型資訊（*bolstering information*）（Li, Chandra and Fan 2021）。<sup>8</sup> 這些資訊傳播措施協助中國在疫情期間進行社會控制、爭取民眾支持。不過，中國政府同時也利用網際網路來傳達倡導型及支持型資訊，藉此提高中國防疫政策正當性、尋求國際民眾支持乃至同情中國人民處境，甚至嘗試樹立國際競爭對手以轉移民眾的注意。例如，中國就利用英語媒介在網路上將美國樹立為無法控制疫情、發表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甚至疑似病毒發源地的競爭對手。這些資訊成功構框閱聽大眾認同，令他們落入「『我們』對決『美國』」（*Us vs. US*）的對立框架之中（Zhao 2020）。

Molter and Diresta（2020）也針對中國操作疫情論述以作為政治宣傳的現象進行研究。他們發現，中國政府為了有效接觸國外英語社群，因此利用英語在網路平台上重塑疫情相關資訊來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這些資訊包括三種主要類型：（1）分享疫情間中國的正向故事以及共產黨的防疫政績；（2）重寫或重塑疫情發展之歷史；以及（3）利用演算法投放有利國家的廣告。這些資訊往往充斥虛假訊息以及陰謀論，中國政府藉此來掩蓋疫情的真實情況、轉移注意力以及免除真正的責任歸屬。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政治傳播是一個世界權力交相互動的場域，不同國家／政治立場的媒體都可能利用各自的政治議程來構框疫情的發

---

8. 指導型資訊指的是向民眾報告危機應對的方法，調整型資訊則是協助民眾應對心理壓力及威脅的信息。倡導型資訊則是危機期間，吸引民眾認同國家政策、增強政策及政體正當性的信息。最後，支持型資訊則是讚揚合作夥伴、對受災者表達同情的一種資訊（Li, Chandra and Fan 2021）。

展。Abbas (2020) 即發現，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以及中國英語媒體《環球時報》(Global Times) 都明顯政治化了疫情。例如，《紐約時報》指責中國共產黨無法第一時間控制疫情擴散，並且利用極權態度對待醫護人員及一般民眾；《環球時報》也反過來指責美國在川普總統任內對疫情反映緩慢柔弱，繼而導致疫情失控。

前述研究凸顯病毒在國際傳播行為中被政治化的過程，其中，國家有意控制媒體，傳播對政黨／國家有利的論述。縱觀各項研究，對中國而言，媒體資訊傳播的主要目的為宣揚國家功績、重塑國家形象，都可歸納為國際政治傳播的公共外交活動。不過，在中國對全球媒體「紅色滲透」的背景下，前述研究並未將受中國影響之國外媒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這些國外媒體如何呈現疫情中的中國形象。為此，本研究將以全球媒介事件作為主要契機，觀察馬來西亞兩家受中國影響的傳統報章媒體（見第一章）呈現何種中國形象。

## 二、批判論述分析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了解媒體對中國疫情呈現的方式？這種全球媒介事件是否可以區辯出不同語言別的媒體受到哪些意識形態影響？隨著語言學研究領域愈加廣闊，不少學者開始將媒體論述視為語言材料，進一步加以詮釋及分析（倪炎元 2003）。當分析從語言符號的「選擇」轉自「批判」，相關學者會循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方式分析之。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學界有不同流派，分析視角和方法也有所差異，但他們的分析取向皆在語言和社會的假設上。

CDA的取向至少包含成因分析、社會行為者（social actors approach, SAA）、辯證關係（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DRA）、論述歷史（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及社會認知徑（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途徑等（Wodak and Meyer 2016, 1-22）。不過，各研

究批判論述分析旨趣聚焦在社會論述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爭議、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尤其對批判性別、族群、階級等不平等議題感到興趣（van Dijk 1997, 22-23; Reisigl & Wodak 2016, 23-61; Wodak 2014, 16-302）。

針對CDA的研究，台灣傳播學界的研究聚焦三大題材：（一）探討CDA的理論流派、背景和策略操作，如傳播學者倪炎元梳理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建構策略，研究對象包括語言學者Teun A.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Roger Fowler等（倪炎元 2003, 85-111；2013, 41-78）；（二）教科書的批判分析，如教育學者王雅玄（2005）聚焦社會領域的教科書；（三）分析文本、發言或報告，如總統和經濟部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的發言內容（倪炎元 2017）、分析監察院的〈曹小妹母攜女燒炭自殺事件調查報告〉（鄭怡世 2019）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建政70週年閱兵活動的論述策略（顏瑞宏 2021）；接著分析媒體文本，如2000年及2008年總統選舉、《旺報》對中兩岸新聞報導、台灣女性政治人物、東南亞新二代的報導分析等（黃靖惠 2011；鍾孫婷 2017；楊堯茹 2017；李美賢、關河嘉 2018）。

總體而言，中文傳播學界鮮少以CDA分析不同語言媒體的論述，難探出在一個社會內中國因素的是否存語言差異的影響。本研究旨在揭露《星洲日報》和《星報》在疫情期間針對不同議題的論述操作，探討媒體是否有特定的立場和偏好何種議題？其又如何透過論述方式呈現其關切議題呢？論述方式是否有意識形態的窺入？

若要著手於意識形態研究，倪炎元（2018）指van Dijk分析架構有助於研究人員從日常語言的文本中，發現隱藏在字海裡的意識形態密碼。本研究將參照van Dijk的「社會認知」取向對兩報進行分析。

### 三、「社會認知」取向：van Dijk 論述分析

van Dijk的關懷在於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

面向探究語言的生成和理解，觀察文本會受怎麼樣的意識形態影響，從中了解語言與宏觀情境連結下的生產（Condor and Antaki 1997, 320-321）。

首先，van Dijk將論述分為三個向度：文本（text）、社會認知或互文性（cognition social or intertextuality），文本的社會脈絡或文化實踐（social context or practice culture of a text）。我們可以透過文本的結構共通點，了解特定團體成員所共享的社會信仰，如意見、態度、規範、價值和意識形態，還包括促使這些社會信仰有效運作的認知策略，包含詮釋、推測引申、分類、比較、評估等（倪炎元 2003; Kadju and Gusfa 2021, 3）。

van Dijk 認為，論述結構可揭露媒體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與政治脈絡，探究其是否試圖濫用權力、建構社會、文化規範，並且透過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機制來合理化宰制和不平等權利論述的失衡關係（van Dijk 2004）。這些探究促使van Dijk建構出一個有意義的論述結構框架來分析任何新聞故事或報章文章。其把結構區分為總體結構（Macrostructures）、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s）和微體結構（Microstructures）：

### （一）總體結構

van Dijk（1988）指，新聞論述中總體結構具有主題性（theme/topic），研究者可從中看出該文章欲討論或描述的主要主題。新聞總體結構往往會在標題（headlines）、導言（leads）與各段落的起始句呈現。

當一篇新聞再現於公眾視野後，與此內容相關的一組社會知識與信仰將隨即啟動。新聞內容中的社會文化脈絡、意識型態，將主導編輯在編排內容時，引申出內容的主題結構、更影響編輯的下標、導言寫作、各個段落的呈現的形式。也就是說，無論從結構還是認知術語來看，研究者可從新聞媒體文章中的總體結構探出其主題暗示（thematic

signal)。

## (二) 上層結構

「上層結構」可理解為整體故事基模 (scheme of story) 或故事文法 (story grammar)。我們可從新聞文章的上層結構中探究文章的敘事結構 (narrative structure) 包括規則、安排和組織方式。van Dijk舉例，新聞基模包含一組類目和編組此一類目的規則：如標題、導言、背景、引述、主要事件、先前事件、結局後果、評論、歷史等。

根據倪炎元 (2003)，這些形式都是由一句或一組命題的語句所組成。研究者從事論述分析時，可以從不同類目清楚的了解其編排方式，並梳理各個脈絡。新聞文本的類目組成本身有一定的約定俗成，如導言將位居於文章的第一段，主要事件和 (main event) 背景 (background) 將會編排在導言之後，接著是該事件情勢 (circumstances)、歷史 (history)、和先前事件 (previous event)。對於事件的評論 (comment)、預期 (expectation) 和評估 (evaluation) 將居尾。不過，未必所有文章都會以這樣的形式呈現，有時會出現變異，導致組裝排序更動置換。

## (三) 微體結構

微體結構的主要途徑為部分語意分析 (local semantic analysis)，主要檢視各個詞彙與語句中的策略性意義 (strategic meaning)、功能與語句間的關聯。van Dijk (1991) 指，策略性意義讓研究者得以檢視文章背後的修辭與風格操作，更能了解文本的隱晦意涵。然而，對微體結構之研究，本文聚焦在以下三個面向：

- (1) 句法 (syntax)：即文句的構成方式。van Dijk (1988, 81) 在句法功能上聚焦被動語態的使用。他指，新聞人物在新聞報導中的施動與受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記者對該新聞當事人的態度。一旦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以被動詞句呈現，新聞報導的句法結構將「暗示」其主動性和責任歸屬只被置於次要位置，研究者可據此分析該報導的

意識形態 (van Dijk 1988, 引自黃靖惠 2011)。

- (2) 詞彙風格 (lexical style)：係指論述所選用詞彙。風格實現決定於具體的詞彙類型和事先設定好的意識形態背景。具體詞彙可以理解為報導的正式程度、雙方關係、所屬團體或制度背景，尤其是記者的態度，因此可以了解他的意識形態。例如記者選擇「恐怖主義者」或「自由鬥士」來報導同一個人。因此，從中可以看出不同媒體與記者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 (van Dijk 1988, 81)。
- (3) 修辭 (rhetoric)：指論述修飾，報導的修辭和結構策略取決於傳播目標和預期的傳播效果。記者將運用各種可能提升新聞特徵和顯著性的方式來達到傳播目的。van Dijk特別關注新聞報導如何增加說服效果，如增加報導的真實性和可能性，包括描寫事件的過程、引述可靠來源（如官方、專業人士）的說辭、提供精確的數據（人數、時間、事件）。再者，提供觀點和態度的訊息，若新聞能觸動讀者的情感，將有效喚起記憶及理解；引述不同背景和意識形態的人之看法，以增加報導的可信度。一般情況下，記者選擇的消息來源與媒體意識形態相關。除此之外，van Dijk關注如何呈現我方／他者，如記者針是否透過誇大、委婉論述、轉喻 (metonymy) 及隱喻 (metaphor) 報導正負面的事件。不同字詞的意涵和概念，透露出我方／他者的正負面特性。基本上，記者在報導取向將與媒體機構意識形態一致 (van Dijk 1998, 82-94)。

概括來說，根據van Dijk的分析途徑，可以探出媒體對相關議題的意識形態。本研究將藉此觀察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和《星報》在不同議題上如何呈現中國形象，檢視語言差異可否顯示不同的議題偏好，與意識形態操作。

##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 一、中國疫情媒體再現之分析方法

本文以馬來西亞中文報《星洲日報》和英文報《星報》為分析對象。《星洲日報》於1929年創立於新加坡，創辦人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1966年在馬來西亞設立印刷廠，1970年後全部編排皆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是馬來西亞最具代表性的華文報紙之一，1988年復刊後由東馬伐木大亨張曉卿收購，每年的銷量扶搖直上，成為馬來西亞銷量第一的中文報（黃國富 2002；彭偉步 2008）。

就媒體「中國因素」背景而言，《星洲日報》所有機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董事會主席張曉卿近20年來，不斷在中國投資、入股在地企業。而世華集團於2016年將持73.01%的萬華媒體股權，以4.98億港幣出售給中國國企青島西海岸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林怡廷 2016）。2023年，世華媒體集團宣稱，世華乃中國海外華文媒體，「將發揮媒體的影響力和傳播力，讓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主張和平發展的中國」。<sup>9</sup>

黃國富（2021）則發現，張曉卿在《星洲日報》的文章中，會強調血緣情感與文化紐帶，有隱約召喚跨國界的中華民族意識，也明確提及血緣的民族主義，顯見將「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匯聚為「祖籍國」的想像，藉此影響讀者的身分與政治認同。

而《星報》是馬來西亞發行量最高的英文報章，其40%的股權由政黨「馬華公會」所擁有。2016年，時任馬華副總會長拿督斯里何國忠在參與「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時指出，馬華是全球首個支持一帶一

---

9. 星洲網，2023，〈張聰：發揮華文媒體影響力 讓世界看見真實中國〉，網址：<https://www.sinchew.com.my/20230309/%E5%BC%A0%E8%81%AA%EF%BC%9A%E5%8F%91%E6%8C%A5%E5%8D%8E%E6%96%87%E5%AA%92%E4%BD%93%E5%BD%B1%E5%93%8D%E5%8A%9B-%E8%AE%A9%E4%B8%96%E7%95%8C%E7%9C%8B%E8%A7%81%E7%9C%9F%E5%AE%9E%E4%B8%AD/>，查閱時間：2023/04/08。

路戰略構想的政黨。<sup>10</sup>

除了最大股權持有者的傾向，艾利艾智庫直接列明「馬華公會」為「親中」政黨（Pro-China tycoons），其旗下的《星報》會定期讚揚中國官員以討好中共（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19）。《星報》集團高層曾公開表明，集團長期關注和報導中國發展狀況，與不少中國媒體合作，並願意與馬來西亞中國大使館保持密切關係。<sup>11</sup>

因此這兩份報紙對本文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成為本論文的研究個案。本研究主要探討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及《星報》對中國新冠疫情的內容呈現方式，討論它們所呈現的內容具有哪些立場、呈現了哪種疫情間的中國形象。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我們列出一般中國疫情報導可能會出現的詞彙作為關鍵字搜尋，中文部分包括「中國」、「武漢」、「新冠」、「肺炎」；英文的部分有「covid」、「pandemic」、「china」、「coronavirus」、「wuhan」等字眼。

接著，以Python網路爬蟲（Web Crawler）技術總共爬取了370篇《星洲日報》及356《星報》篇相關文章。由於本研究於執行階段無法預見疫情的發展動向及結束時程，因此特別限定觀察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間有關中國疫情的內容，並分類出媒體報導、社論、讀者投書和大使文章（相關爭議性議題呈現件數請見表1）。本研究以van Dijk的分析途徑探討媒體的意識形態，而讀者投書和大使文章非媒體或新聞工作者所產出的內容，所以後續文本分析上將不分析讀者投書與大

10. e南洋，2017，〈何國忠:全球首個政黨 馬華率先支持一帶一路〉，網址：<https://www.enanyang.my/%E6%97%B6%E4%BA%8B/%E4%BD%95%E5%9B%BD%E5%BF%A0%E5%85%A8%E7%90%83%E9%A6%96%E4%B8%AA%E6%94%BF%E5%85%9A-%E9%A9%AC%E5%8D%8E%E7%8E%87%E5%85%88%E6%94%AF%E6%8C%81%E4%B8%80%E5%B8%A6%E4%B8%80%E8%B7%AF>，查閱時間：2022/07/08。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2023，〈唐銳公使參訪馬來西亞星報媒體集團〉，網址：[http://my.china-embassy.gov.cn/sgxw/202302/t20230221\\_11028785.htm](http://my.china-embassy.gov.cn/sgxw/202302/t20230221_11028785.htm)，查閱時間：2023/02/28。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2022，〈歐陽玉靖大使參訪馬來西亞星報媒體集團〉，網址：[http://my.china-embassy.gov.cn/sgxw/202207/t20220727\\_10728791.htm](http://my.china-embassy.gov.cn/sgxw/202207/t20220727_10728791.htm)，查閱時間：2022/07/30。

使文章，以避免出現研究偏差。

另外，新冠疫情所影響的社會範圍、地理空間、時間十分漫長且巨大，一些與疫情沒有直接相關的事件可能因發生在疫情期間，也可能因關鍵字作用而被納入個案。再者，本研究題旨關心疫情期間中國形象的呈現，而疫情中一些爭議性較高的議題往往對中國國家形象影響較大，因此更有助於觀察媒體對其形象之刻畫。為此，我們採用立意抽樣方法，以「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等相關議題為基準，透過標題檢閱及內容閱讀的方式，從兩年來的資料中抽選符合這些事件的所有內容。本研究之所以聚焦上述四項議題，乃因（1）這些議題在中國國內直接關涉當地民眾情感及日常生活，引起的爭議較具代表性；（2）這些議題涵蓋「中國國家形象」及「威權治理方式」的爭議，是中國對外宣傳時較為重視的議題，前者涉及中國作為「大國」所嘗試樹立的地位及聲望，後者涉及中國強調威權治理的有效性，以反擊民主陣營的政治指責；（3）相較於疫情期間的經濟政策、疫苗爭議等關涉專業知識的議題，前述四項議題指向日常生活的經驗，閱聽大眾較易親近，媒體也較容易建構及操作內容。以下簡單就四項議題進行說明。

首先，「醫護形象及其爭議」指的是中國疫情爆發初期，針對醫護人員形象所作的連串詆毀、打壓，直至後期的認同、讚許及宣揚，其中又以李文亮醫生相關事件最為人所知。這類型議題涉及歷史的改寫，有利於中國顛覆民眾的記憶以及國際社會的指責。其次，「資訊控制」指的是中共透過國家機器控制疫情相關訊息，包括限制資訊的發出、流傳、接收，以及回應特定資訊（抗議、否認等）等相關事件。其三，「人身自由控制」指的是中共對廣大民眾乃至特定人士之身體行動之限制，包括威權式封城，以及監禁人權分子、記者、知識分子等事件。最後，「病毒起源」則是指病毒起源地的一系列辯論，包括中共淡化武漢作為發源地的種種嘗試、國際社會對起源地的討論，以及中國對美國作

為病毒起源地的指控等等。本研究根據上述四類議題進行立意抽樣，取得《星洲日報》樣本數102筆，《星報》樣本數76筆。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和批判論述分析。內容分析法有助於我們決定分析單元與選出有代表性的樣本，其重點在了解文本在傳播脈絡下的意義，其中包含誰在什麼社會情景下，運用哪種中介與對方溝通，為什麼溝通等。而判論述分析可以彌補內容分析法的不足，研究者可據此研究出媒體的意識形態（倪炎元 2003）。

## 二、內容分析法：類目建構

Boyle et al. (2015) 指出內容分析法可將內容單元化、在編碼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其顯性內容 (manifest content)<sup>12</sup> 和隱性內容 (latent content)<sup>13</sup>。經過一連串的重複程序，從文本提煉出有效資料，可以有效了解資料和其闡述情景的方法 (Krippendorff 2004; Weber 1985)。所以，本文以內容分析法對媒體內容的來源類型（新聞報導、新聞引述、社論、大使文章）、議題類型（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內容呈現方式（正面、負面、中性），以及內容分析等方式進行整理和編碼。以下將特別說明媒體內容呈現方式的編碼方法：

就媒體內容呈現方式而言，Molter and Diresta (2020) 在研究中國國營媒體報導新冠疫情時，利用關鍵字辨識媒體內容的正面、負面或中性特性，當媒體內容出現「康復」、「穩定」、「解封」、「確診下降」等關鍵字時即被編碼為「正面」內容；相反地，當內容出現「死亡」、「混亂」、「確診高居不下」等關鍵字時則被編碼為「負面」內容。這種編碼方式有其局限。首先，記者並沒有說明「中性」內容的特質。此外，在疫情急劇擴散，並轉變成全球共有經驗的情況下，「死

---

12. 傳播媒介基本、表面內容。

13. 內容分析時，閱讀內容的字裡行間，才能了解深層意涵。

亡」、「混亂」可能只是一種「中性」的陳述，並不具有指涉國家能力缺失、道德價值敗壞的負面意義。再者，這種編碼也忽略了國家抗疫過程中的權力互動以及官方的價值宣稱。例如，「封城」一詞可能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價值，隱含疫情失控的涵義，是「負面」的。不過，在「封城」相關報到中，官方可能對外強調其政策的正當性及有效性，而這種正面陳述正好扭轉了「封城」的負面意涵，可能使這則新聞被視為一種「正面」的報導。換言之，媒體內容分析要比關鍵字更為複雜，研究者需要經過完整的內容閱讀及分析，才能對其進行分類。

對此，我們將針對每一則媒體報導之內容進行編碼，將其分成三類：正面類別指的是新聞報導的主要內容為（1）中國政府有效控制疫情，過程中強調其正當性及有效性；（2）中國政府為疫情造成的損失發出道歉聲明與補償；（3）強調社會和諧、穩定、民族榮譽；（4）強調國家、政黨地位，以及對世界之貢獻。負面類別指的是主要內容為（1）批評中國政府疫情管控策略，強調其違反特定價值；（2）批評中國政府針對資訊、個人、團體或特定國際組織進行迫害或壓制；（3）批評中國社會疫情期間混亂、失序，以及人權迫害等等；（4）批評中國政府應為國際社會負責。最後，中性類別則同時涵蓋上述兩類內容，各內容分量也較為均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透過上述指標，將報章內容分為正面、負面與中性三個類別變項。不過，為了更細緻的分析，我們也對這些內容重新編碼為連續變項的「內容呈現正向程度」（0分至2分），這意味著得分越高，媒體對事件的立場採取較正面的態度。透過類別變項與連續變項的編碼，本研究將透過卡方檢定以及迴歸分析來探討報章、議題類型、內容呈現方式之間的複雜關係。

### 三、批判論述分析：van Dijk 論述分析

看似客觀且中立的報導論述，實際上會挾帶著認同政治的張力（倪

炎元 2013)。欲釐清媒體意識形態，必須拆解語言且加以分析。van Dijk的論述策略，包括「總體」、「上層結構」及「微體」層次，可以探出隱而未顯的意識形態。

本文在分析上將解釋新聞報導中語句、語法、語意，再探究論述背後的含義及暗示。由於論事乃一種事實結果，批判論述分析得以讓我們從結果逆推回去，拆解與解讀論述的生產元素（倪炎元 2013）。

若要探究各報章的框架，從編碼後的類目再給予一個清晰的論述分析是尤其重要的。本文從《星洲日報》和《星報》中的四種議題類型（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運用van Dijk的論述分析策略，分析兩報一般新聞中，樣式相似度最高的報導（不包括讀者投書和大使署名文章），剖析他們的總體結構乃至微體結構，試圖探討兩家媒體如何再現中國疫情相關報導，由此發現其對不同議題有特定偏好。相關分析如下，本文將以斜體字和在文字上加上下，以分析文章重點。

##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 一、不同語言媒體報章報導項目的組間差距

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疫情，迅速引起世界各地媒體報導。疫情凸顯了中國在資訊控管、人身自由限制，以及公衛體系應對能力等爭議性問題。對積極進行「外宣」、嘗試建構良好「形象」的中國而言，這場疫情對其媒體公關形成巨大的挑戰。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在該年12月31日發布了第一則有關中國疫情的報導，並且在翌年1月中旬開始密切跟進報導；英文報刊《星報》也在2020年1月18日開始追蹤相關新聞，呈現出疫情期間中國及其政府的各類形象。截至2021年12月31日為止，針對疫情間中國境內四項爭議性事件的報導與文章，《星洲日報》

共102則，《星報》則有76則。下表呈現出兩份報刊對各個爭議性事件報導與其他文章的件數：

表一 《星洲日報》與《星報》的爭議性議題呈現件數

項目	《星洲日報》			《星報》		
	新聞	社論／ 讀者投書	總數	新聞	社論／ 讀者投書	總數
醫護形象及其爭議	25	11	36	16	2	18
資訊控制	19	10	29	19	1	20
人身自由控制	13	2	15	23	1	24
病毒發源地	17	5	22	11	3	14
加總	74	28	102	69	7	76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自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星洲日報》及《星報》之新冠疫情相關爭議報導。

我們發現，在四項爭議性事件中，《星洲日報》對醫護形象、資訊控制、病毒發源地等相關爭議性議題的新聞報導、社論或讀者投書，都比《星報》來得多。相對的，《星報》對人身自由控制相關事件報導則較《星洲日報》多了10則。透過卡方鑑定，我們發現兩份報刊對各項爭議性議題的報道與社會或讀者投書的加總件數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P=0.049, <0.05$ ），意味著對不同爭議性議題的呈現具有組間差異。換句話說，當前述爭議性議題發生時，不同媒體機構給予的關注可能有所差別。

問題是，該如何解釋不同媒體間在議題關注上的差異？在缺乏更多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先是嘗試理解四項爭議性議題具有哪些共同的核心價值或敘事結構。根據報章呈現內容，我們發現醫護形象以及病毒發源地相關事件涉及較多道德爭議問題。李文亮醫生事件是醫護形象及其爭議中的典型事件，他作為最早公開變種冠狀病毒存在的醫生，很快就因「在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而被武漢市公安局警示和訓誡。在官方與民間輿論中，李文亮最初被視為一名「造謠者」，但到了1月9日，中國官

方承認新型冠狀病毒的存在，李文亮轉變為一名「吹哨者」。直至李文亮感染患病、不幸過世，引起民眾劇烈反彈，官方才被迫替他正名，甚至被迫封先進個人等稱號。從「造謠」到「吹哨」、從「受冤」到「正名」，李文亮事件抵觸了中國傳統社會對名節的重視以及對冤屈的氣憤，後者更是中國傳統敘事的重要主題。

接著，自2019年底武漢爆發疫情後，中國一直被視為病毒發源地。最初，官方及媒體將視角聚焦在武漢華南市場的「野味」上，認為蝙蝠及穿山甲是病毒宿主，並透過飲食文化傳播到人身上。輿論緊接著直指新病毒洩漏自中國武漢P4實驗室，引起中方駁斥。直到2021年1月，新華社副社長與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相繼指病毒與美國有關，質疑美國公民將病毒傳播到中國武漢，呼籲美國開放國際組織徹查。隨後，中國與美國不斷就病毒起源相互指責，至今仍未有定論。此處應注意的是，病毒起源國家不僅需要為疫情的擴散進行交代，同時也因為病毒具有汙名效應，而被視為一種有損國格的象徵符號。更甚的是，對一個曾經在列強圍繞、現代化路途上掙扎求存的傳統國家而言，病毒還召喚了過去被列強壓迫與汙名化的經驗，例如有論者將病毒起源問題視為當代的「庚子賠款」。<sup>14</sup>

相對來說，資訊控制類別的相關新聞呈現了中國在疫情時期疑似隱匿情報，或透過限制發言、屏蔽資訊，或回應／修正／抨擊輿論等方式，對來自網路、媒體、境外國家的資訊進行控制。人身自由控制類別的新聞則彰顯中國利用封閉空間、限制人員流動或強行逮捕等方式來回應疫情時期的危機。無論是對資訊或人身自由的強制控管，其實都抵觸了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尤其在疫情最初，中國的這些行徑引來逐多批評或討論。然而，諸如封城、禁旅等策略在首波疫情階段獲得相當正面的效果，也使得這些策略獲得許多肯定。無論如何，這兩類新聞反映

---

14. 舒慶祥，〈憶起1900年的「庚子賠款」〉，〈星洲日報〉網址：<https://reurl.cc/7pLMrN>。查閱時間：2022年3月2日。

的是疫情間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衝擊，可說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核心議題。

這些類型特質如何影響不同語言媒體的報導偏好？首先，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與病毒起源問題都挑戰了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與歷史記憶。這種挑戰關涉族群乃至國族的尊嚴或情感，因此容易引起文化相近的社群關注。《星洲日報》的主要閱聽對象為華人讀者，在選材上可能更傾向符合讀者的資訊及情感需求，以較多篇幅呈現醫護形象及病毒發源地事件。另一方面，《星報》以英語受眾為主，這些讀者的語言文化教育可能使他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實踐與矛盾更為關注，繼而令《星報》呈現更多相關議題的新聞。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媒體在閱聽群眾或其他因素的影響下，會更為關注特定事件的發展。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忽視其他事件的發生。例如，《星洲日報》在資訊控制類新聞事件上，就呈現了較病毒起源爭議更多件的報導及文章。實際上，這也反映出特定新聞事件的豐富性。媒體作為報導事件的主要媒介，往往要從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蒐集資料進行報導。因此，新聞報導的件數可以對應實際事件的件數，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可說是新聞採集的資源池。就此而言，中國對資訊的控制、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對自身立場澄清的發生次數就較病毒發源地等爭議來得頻繁，提升了媒體的報導件數。

不過，前述組內（單一媒體中）不同類型新聞呈現的比較並非本文重點。本研究關心的是組間（不同語言媒體間）對特定新聞議題的呈現，透過資料蒐集與統計，我們證明了兩大報刊對特定類型議題的呈現具有組間差異，說明了報刊閱聽大眾、文化關懷傾向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 二、不同語言報章針對爭議性議題的內容呈現

在上一節，我們證實了《星洲日報》與《星報》在不同類型爭議性

事件的呈現次數上存在著組間差異。不過，次數的差異並無法說明媒體報章在形塑疫情間中國形象的立場。因此，本節將進一步討論：各別報章呈現這些議題內容的方式是否具有差異？不同類型的內容間是否也有正／負向的差異？他們又是如何呈現相關內容呢？表2呈現了兩家媒體對不同類型議題的內容呈現上正面／中性／負面內容的分配：

表二 《星洲日報》及《星報》對不同類型議題內容呈現方式件數及比例

	《星洲日報》					《星報》				
	議題1	議題2	議題3	議題4	加總	議題1	議題2	議題3	議題4	加總
正面	13 (36.1%)	9 (30%)	5 (33.3%)	13 (59.1%)	40	1 (5.6%)	5 (25%)	16 (66.7%)	10 (66.7%)	32
中性	7 (19.4%)	6 (20%)	6 (40%)	3 (13.6%)	22	2 (11.1%)	4 (20%)	5 (20.8%)	1 (6.7%)	12
負面	16 (44.4%)	15 (50%)	4 (26.7%)	6 (27.3%)	41	15 (83.3%)	11 (55%)	3 (12.5%)	4 (26.7%)	33

註：議題1為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議題2為資訊控制、議題3為人身自由控制、議題4為病毒起源相關議題。資料來源：作者蒐集自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星洲日報》及《星報》之新冠疫情相關爭議報導。

表2說明了《星洲日報》與《星報》面對不同議題時所採取的呈現方式。就組內針對特定議題的立場比較而言（即媒體本身對特定議題的呈現方式比較），《星洲日報》主要以負面方式呈現醫護形象（議題1）以及資訊控制相關內容（議題2）；面對病毒起源相關爭議時（議題4），則主要以正面方式呈現其內容。至於人身自由相關事件個案數較少，不同立場形式僅差距1例，無法有效說明該報立場。另一方面，《星報》主要以正面方式呈現人身自由控制以及病毒起源相關議題，並以負面方式呈現醫護形象以及資訊控制相關議題。

接下來的問題是，不同報章呈現上述議題內容的方式是否具有統計上的差異？若將不同立場的呈現方式視為正／負／中性類別，透過卡

方檢定，我們可以發現兩份報章整體報導內容（即不分議題類型）的正面（ $P=0.624, >0.05$ ）以及中性（ $P=0.612, >0.05$ ）立場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兩家報章的正面及中性立場並無組間差異。不過，兩家報章的負面（ $P=0.032, <0.05$ ）立場則存在著組間差異，亦即在對整體報導內容作呈現時，負面立場會因中英媒體而有所差異。另一方面，我們依正／負／中性類別與新聞議題，依次作卡方檢定，發現除了中性類別之外（ $P=0.249, >0.05$ ），正面和負面類別在不同新聞議題之間均有顯著差異（ $P=0.00, <0.05$ ），說明兩家報章會隨著不同議題而調整其正面及負面立場。

然而，前述分析方法無法讓我們理解不同媒體在面對特定議題時，誰會較傾向採取正面／負面／中性立場？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重新將媒體立場編碼為連續變項「內容呈現正向程度」（0分至2分），這意味著得分越高，媒體對事件的立場採取較正面的態度。接著，我們透過簡單迴歸來分析在不同議題上，以及不同媒體在面對特定議題時，是否會影響他們的正面呈現程度。表三為迴歸分析結果：

表三 內容呈現正向程度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 內容呈現正向程度	
議題類型 (對照組：醫護形象及其爭議)	
議題類型 (2)：資訊控制	.478*
議題類型 (3)：人身自由控制	1.319***
議題類型 (4)：病毒起源相關爭議	1.278***
《星洲日報》針對個別議題報導正向程度 (對照組：《星報》)	
議題類型 (1)：醫護形象及其爭議	.694***
議題類型 (2)：資訊控制	.128
議題類型 (3)：人身自由控制	-.475*
議題類型 (4)：病毒起源相關爭議	-.182
_cons	.222
Observations	178
R-squared	.185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  $p < .01$ , \*\*  $p < .05$ , \*  $p < .1$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自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星洲日報》及《星報》之新冠疫情相關爭議報導。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議題類型確實會影響媒體內容呈現的正向程度，其中各類型都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05$ )。較之以醫護形象相關爭議，兩家媒體在呈現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等相關內容時，都以較為正向的方式呈現。其中，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相關爭議內容的迴歸係數更達1.2以上。這項結果顯示，媒體在面對此二議題時，會比面對醫護形象相關新聞給予中性以上的態度。然而，若以《星

報》作為參照組，《星洲日報》顯著的以更為正面的方式呈現醫護形象相關爭議（0.694），以及顯著地以較負面的方式呈現人身自由控制相關事件（-0.475）。

進一步來說，儘管《星洲日報》在呈現醫護形象相關議題時，也涵蓋冤屈、民間激烈反彈、本地公眾不平情緒等被視為較「負面」的內容，但比起《星報》，它卻十分凸顯中國官方、官媒講究社會正義及道德價值的應對態度，尤其多番呈現典型事件中李文亮醫生在世時的優異表現與人格，強調他作為共產黨員的身分。這種「正面」呈現方式凸顯中國官方乃至領導人（習近平）態度、策略、做法的正當性，強化了黨國的地位。相較於此，《星洲日報》也比起《星報》以較負面的方式呈現人身自由控制相關議題。這些例子包括凸顯武漢封城時期的混亂局勢、中國人權異議分子或公民記者遭到關押的事件，乃至後期中國堅持清零而限制自由所引發的種種議題等等。

在上一節中，我們認為華文報章《星洲日報》基於傳統道德價值而特別關注醫護形象及醫護人員所遭受的冤屈，相反地，英文報紙《星報》則基於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而更為關注資訊與人身自由控制等事件。不過，比較兩家媒體以後，我們發現媒體對特定議題的高度關注，並未使該媒體較其他媒體更為正面地呈現相關內容。以上述兩項議題為例，醫護形象因李文亮醫生相關事件在疫情初期即引起全球矚目，國際社會也做出許多批判。然而，《星洲日報》在呈現李文亮醫生的冤屈及國際社會的譴責之外，也更為強調黨國地位的正當性，部分內容更將李文亮先詮釋為共產黨員，然後才是一名醫生。《星洲日報》高層與中國黨國政要私人關係密切，這種呈現方式是否與此有關，值得深入研究。不過，若前述政治關係的影響為真，它並未延續至對人身自由相關議題的內容呈現上。在這方面，《星洲日報》較《星報》採取更負面的表達方式。然而，其中有近一半的內容聚焦在中國堅持清零的政策上。這項政策與國際情勢脫軌，也不符合馬來西亞國情需求，可能影響該報的呈現

立場。

另外，不同報章在呈現其他各類議題的方式並未有統計顯著上的差異，但我們仍能透過詳細的內容分析來討論其呈現特質。在下一節中，我們將透過批判論述分析方法來討論報章如何呈現這些議題，其中的類同與差異為何？不同語言報章背後是否有一套共同的敘事形態？

### 三、批判論述分析

為了了解報章對不同議題的意識形態的呈現，本節從《星洲日報》及《星報》中選取各類別中的文章，進行van Dijk論述結構分析。因往後都會以「記者」一詞來形容文章撰稿人，這裡必須強調，雖從表面上看來，處理和蒐集新聞的似乎是「個人」，但記者並非獨立的個體，他們的工作需要符合組織、職業乃至閱聽人的需要（Hirsch, Miller and Kline 1977, 21）。換句話說，以下的分析將代表媒體機構的意識形態：

#### （一）對醫護形象及其爭議的論述操作

本文觀察到，《星洲日報》在呈現醫護形象及其爭議的議題上，有相當高的比例以一般新聞呈現正面形象，反而以讀者投書或專欄呈現負面形象。反觀《星報》不論任何類型的文章，基本以負面方式呈現中國醫護形象。不過，因新聞圖示和架構與讀者投書和專欄有別。所以，以下只分析一般新聞：

#### 報導論述摘錄一：詞彙風格（Lexical Style）

2019年，「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因披露新疫情而被指控「造謠」。事情發酵後，中國官方也開始更改定性，將因新冠疫情而犧牲的一線醫護人員稱之為「烈士」。<sup>15</sup> 在比較《星洲日報》和《星報》後發現，二

15. 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據《烈士褒揚條例》和《退役軍人事務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關於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精神，評定王兵、馮效

者在語意總體結構（主標）和文章構成之總體結構（概述的導言）運用了截然不同的詞彙風格來形容因為疫情而犧牲的醫護：

「中防疫沒失信於民」 崔天凱贊李文亮好醫生（星洲日報 2020a）

Wuhan residents remember coronavirus '*whistleblower*' doctor a year after his death (Kriton 2021)

鐘南山接受路透社專訪，說明當前的新冠肺炎防疫最新形勢，談到染病逝世的李文亮醫生時，不禁老淚縱橫，說「大多數人認為他是中國的英雄，我也是，我為他感到自豪，他在（2019年）12月底告訴人們真相，後來他就去世了。」（星洲日報 2020b）

A Wuhan doctor who worked with coronavirus *whistleblower* Li Wenliang died of the virus last week, state media reported Tuesday (June 2), becoming China's first Covid-19 (coronavirus) fatality in weeks (The Star 2020a).

《星洲日報》的記者在不同的報導中使用「英雄」、「好醫生」的詞彙形容李文亮醫生，反觀《星報》以「吹哨者」稱呼李文亮或其他犧牲的醫護人員。van Dijk（1988, 81）指出，詞彙風格的選擇將顯示記者的所屬集團、雙方關係或制度背景。與其說「英雄」或「吹哨者」是語義問題，毋寧說是間接表達詞彙背後隱含的價值觀念。

### 報導論述摘錄二：修辭（rhetoric）

對新聞論述來說，修辭有著具體目的和功能。新聞中的修辭手法和

---

林、江學慶、劉智明、李文亮、張抗美、肖俊、吳湧、柳帆、夏思思、黃文軍、梅仲明、彭銀華、廖建軍等14名（按姓氏筆劃排序）犧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人員為首批烈士。〈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犧牲人員被評定為首批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2/content\\_5498352.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2/content_5498352.htm)。查閱時間：2022年9月10日。

引述取決於記者的傳播目標和傳播效果。為了強調新聞事件的真實性，《星洲日報》和《星報》在醫護形象及其爭議的論述上，都引用可靠來源論述（persuasive content features）和使用隱喻（metaphor）的修辭，尤其涉及到觀點。

本文發現，《星洲日報》更偏好引用中國官方論述，除了上述舉例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和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長鐘南山，還在〈中國駐法使館：用「吹哨者」形容李文亮是在分裂中國民意〉和〈中駐英大使：李文亮非吹哨人 中國不是病毒起源〉引述了中國駐法使館、中駐英大使的說辭：

中國駐法國使館9日發文，對染病離世的李文亮“深表痛惜和哀悼”，不過文章也指用“吹哨者”形容為李文亮是給他貼上政治化標籤，居心不良，目的是分裂中國民意，也玷污了李文亮醫生的名譽，是不道德的。（星洲日報2020c）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近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節目訪問時表示，已故武漢醫師李文亮並非疫情吹哨人，中國也未隱匿疫情。（星洲日報2020d）

相較之下，《星報》的報導以“Probe: Action against doctor inappropriate”之主標，指涉對付李文亮醫生為不當行動。此外，內文以「多數人」、「網友們」等論述，建構出民眾對國家之行動感到氣憤。楊意菁（2013）發現，記者會加諸情緒論述在網友意見上。若記者欲建構讀者的社會認知，除了引用專業人士的說辭，也需要學會使用通則化和情緒性用詞，強化讀者對意見和感受的認同感和代表性（van Dijk 2006）。

An investigation has concluded that police *inappropriately* took action to reprimand Li Wenliang, a doctor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who sounded an early alarm on Covid-19, for “spreading fak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His death triggered great sorrow among

the public, and *many people* believed he was wrongfully accused of “spreading rumours” .

The death from coronavirus of a Chinese doctor who had been reprimanded for issuing an early warning about the disease triggered a wave of *public mourning* on Friday and rare expressions of ange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nline (The Star 2020b).

針對隱喻，為強調我方與他者的正負面形象，不同字詞表達而有不同意義與概念，而此種修辭方式符合記者的自身利益與意識形態（van Dijk 2006, 373-374）。而上述的《星洲日報》的隱喻有意將李文亮形象塑造成「人民英雄」（褒），似乎暗示稱李文亮為「吹哨者」的人居心不良，有分裂中國民意（貶），以此觀之李文亮等醫護人員之「英雄」論述被視為符合《星洲》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我方，而強調「吹哨者」的人們被視為他者。反觀《星報》除了使用「吹哨者」，更在文章加入較負面的“inappropriately took action”（採取不合理行動）的詞彙，顯見《星報》對此事的立場。

## （二）對資訊控制相關事件的論述操作

### 報導論述摘錄一：句法 (syntax)

在資訊控制內容方面，《星洲日報》與《星報》大多都以負面的取向報導相關議題。值得一提的是，《星洲日報》就此議題刊登了至少四篇的駐中大使與領事的署名文章，文章圍繞病毒溯源，強調中國在抗擊病毒上嚴格防控等的正面論述。因本文分析範圍不包括讀者投書與大使文章，在此就不多做分析。

在武漢封城初期，《星洲日報》和《星報》個別報導了〈困武漢馬男：沒澄清謠言·「中處理疫情不透明」〉和“Covid-19: Chinese censors kick teachers out of online classrooms for politics, profanity and smoking”，二者都試著以被動句弱化或維護特定人物或事件與情況：

目前健康狀況良好，但被困在武漢的他說，在武漢市宣布從23日起封城後，儘管懷疑該措施的有效性，但他仍認為，出於恐慌逃離城市是具有風險性的。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我逐漸意識到當地人擔心的不是新型冠狀病毒，而是中共政府處理疫情的無能。自封城以來，所有人都被困在家裡，不知道這座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星洲日報 2020e)

In another case, which was reported on streaming platform Douyin, a politics teacher “*disappeared*” from class when his stream *was blocked* for the use of “sensitive” political terms, while in a third instance, a teacher who smoked a cigarette on camera was put offline (Elmer and Ru 2020).

van Dijk 指出，被字句的寫法很大程度上可以隱晦記者對這些新聞人物或事件的態度。當文章的關鍵人物或事件以被動句型撰寫，意即記者有意弱化其主動性或責任歸屬 (van Dijk 1988, 80-81)。由此可以看出《星洲日報》的報導，以被動句法結構呈現人民「被困在家中」，顯示「弱化封城的有效性／維護和強調資訊透明和人身自由」，之後引述馬來西亞男子的言論，指中共政府處理疫情的無能，修辭有負面的意涵。

在疫情課題上，《星報》以被動句法指出政治系老師「被消失」和「被封鎖」，此種被動句用法弱化了該老師在法律上的責任歸屬，有「弱化教師犯法的可能／維護老師的言論」之傾向。

### 報導論述摘錄二：修辭 (rhetoric)

在資訊控制相關事件的論述上，《星洲日報》和《星報》的關注點不同。本文觀察到，《星洲日報》特別關注「病毒起源」之隱匿訊息，《星報》則關心疫情資訊在「社群媒體上」的流通性，印證 van Dijk (1988) 指的記者更傾向引用與自身機構意識型態相近的論述。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團隊週二（9日）結束對湖北武漢2019冠狀病毒病的溯源工作，世衛總幹事譚德塞週五在冠病疫情例行發布會上表示，專家組最快會於下週發表考察報告，強調目前不排除有關病毒源頭的任何假設。據中新社報導，譚德塞指出，在與部分成員討論後，預計將對病毒溯源的所有假設持開放態度，對相關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和研究，部分工作可能不在本次專家組討論範圍之內（星洲日報 2021a）。

As well as politically sensitive term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WeChat censored* keyword combinations ranging from discussions of Chinese leaders' responses to the outbreak, neutral references to government policies on handling the epidemic, responses to the outbreak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and references to Li Wenliang, a doctor who died after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outbreak.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the *Citizen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 and based on tests of keywords extracted from reports on major news websi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Zhou 2020).

依據文本微體結構之論述修飾，《星洲日報》和《星報》皆為了提升文章說服力，提供相對應的數據與研究。儘管如此，兩報在應用上顯示了自身的意識形態，如《星洲日報》在〈傳中拒提供世衛專家原始數據「冠病起源開放假設」〉一文上引述「中新社」的消息，指譚德塞宣佈病毒溯源國際專家組在中國的實地工作已結束，但相關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早期因在新冠肺炎初期對中國恭敬的態度遭國際批評，這次《星洲日報》除了報導世界衛生組織的行程，資料來源更選自中國國營通訊社，相關意識立場值得探究。

承繼《星報》關心吹哨者「散播謠言」的議題，其在資訊控制內容方面相當關注中國政府控制與審查社群媒體的新冠肺炎資訊。如“*How WeChat censored even neutral messages about Covid-19 in China*”一文中，《星報》引用了多倫多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微信嚴格控制新冠肺炎資

訊，甚至有法可依。相關報告證實中國社交媒體公司早在 2019年12月疾病傳播開始初期，就收獲官方審查資訊的指示。上述《星報》的修辭策略顯示了其意識型態，展現中國政府為了維持正面形象而行使不同手段。

### (三) 對人身自由控制相關事件的論述操作

#### 報導論述摘錄一：總體結構

首先，就人身自由控制相關事件而言，《星洲日報》和《星報》基本採正面報導，皆認為封城是有效的。在語意總體結構方面，《星洲日報》刊登了〈封城一周年 武漢恢復日常了〉，從導言來看，文章有意讓情節記憶再現：

柵欄依然圍著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提醒了這個城市曾經是改變了世界的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震央。除此之外，這個人口1100萬中國中部城市已恢復了日常的忙碌，汽車在高速公路奔馳，人行道上滿是購物人群，而公共交通和公園也很熱鬧（星洲日報 2021b）。

上文使用復原程序（by reinstatement procedures），以「恢復了繁忙」（新資訊）和「柵欄圍著」（舊資訊）連結，有一定的語境功能可以讓讀者回憶起一些片段。van Dijk（1988, 104）指出，此種高層次的宏觀結構（主題）最容易讓讀者回想起早期的基本概況和文本的資訊基礎。當語境功能觸發，其認知、特殊關係的情感、微觀資訊也有可能回憶起來。

《星報》在“Wuhan goes all out to cut sources of coronavirus”這則報導的導言中運用了策略性宏觀理解（strategic macrounderstanding）。

Wuhan, the epicentre of the ongoing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s making the *best* efforts to cut the infection sources by

screening those who are infected and suspected to have been infected via door-to-door visits to ensure *no one is missed* (The Star 2020c).

導言亦指van Dijk所認為主題 (theme/topic)，透過上文，我們可以從導言形式上了解記者欲帶出的主題暗示 (thematic signal)。此說法使用了「最好」 (best) 而非常見符合專業操作和倫理規範不加入主觀意見的新聞寫法。除此之外，記者也強化了他的社會認知，指封城乃好的努力，所以「沒有人被遺漏」 (no one is missed)。這樣的寫法可稱為策略性宏觀理解，意即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和把握，並非始於閱讀全文 (包括詞語和句子) 後，而是從記者在導言中的主題性暗示下開始的。

Jones (1977) 指出，文章形式規則如文章導言、主題和標題，都可以成為記者「暗示」的地方。讀者也可以採用有效的理解策略推理出文本的主題 (van Dijk & Kintsch, 1983)。也就是說看到文章的第一句子就可以推測文本總體或主題內容，心理學稱為「從上至下」思維 (top-down processing.) (van Dijk 1988, 34)。

### 報導論述摘錄二：修辭 (rhetoric)

值得一提的是，《星洲日報》與《星報》關於人身自由控制相關事件的負面文章的報導與修辭方式幾乎一模一樣，以下從修辭角度來分析〈彭博社：「清零」防疫策略或令中國數年「與世隔絕」〉和“Where is the exit from China’s zero tolerance on Covid-19?”：

文章分析，短期之內，中國政府有理由維持嚴厲的防疫措施，至少要持續到明年；決策層肯定不希望爆發重大疫情，進而影響冬奧會和中共二十大。但問題是，無限期實施“零感染”策略的經濟和政治代價不斷攀升，尤其是病毒產生新的變異，有可能更加輕易地突破防疫屏障。

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表示，中國遲早不得不放棄控制式的戰略，可以在一段時間裡實現零感染，但是不可能永遠

如此，因為病毒會乘虛而入。他擔心，由於零病例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中國不會主動調整戰術。尤其是在官員會被問責的情況下，沒人敢放鬆警惕（星洲日報 2021c）。

He (Professor Liang Wannian, head of a panel of experts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said the approach might affect the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but containment of outbreaks had proved beneficial in the longer run.

*But* as other countries look for ways to live with the pathogen and its mutations, there *have been questions* about just how long China should maintain its fortress-like approach.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public debate about such a change, and the trade-offs involved, before this change is made.”

*But* in China such debat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political scientist Chen Daoyin (Zhuang 2021).

2021年11月，當各國已開始嘗試「與病毒共存」政策，中國政府仍舊沒考慮放棄「零容忍政策」，受到各界關注。《星洲日報》與《星報》的報導邏輯一致，先是指中國確實控制了疫情。但是，它們在給遏制疫情積極和正面評價後都加上「但是」，暗示這種方法是不可持續的。van Dijk (1988, 93) 指出，當記者提供局勢相抵觸的觀點，或對一件新聞事件保留態度和消極預測，都不難理解記者與媒體的意識形態。

另外，《星洲日報》在文章末端提及，零病例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星報》結尾則提及，社會對零容忍政策的共識很重要，任何改變及所涉及的權衡取捨都需要公開辯論，記者引述政治學家的說法指，中國幾乎「不可能」有類似的辯論。從修辭角度來看，記者引用其他觀察者的言論，代表其肯認該論點與自身媒體意識形態相近（van Dijk 1988, 93）。

#### (四) 對病毒起源相關爭議的論述操作

##### 報導論述摘錄一：總體結構

從語意總體結構來看，《星洲日報》和《星報》在標題的編排和說法上都顯示其的立場與意識形態。2020年1月23日的報導主標題為〈武漢肺炎起因〉，副標題為〈研究猜測：蝙蝠傳蛇再傳人〉（星洲日報 2020f）；接著於1月27日開始，標題開始有堅定的語義總體結構安排，如27日主標題為〈網站指武漢「P4」實驗室洩病毒〉，副標乃〈中使館斥居心叵測〉（星洲日報 2020g）；或2月3日的報導主標為〈武漢肺炎傳出陰謀論〉，副標〈無證據證實病毒來自實驗室〉（星洲日報 2020h）。

相較之，不管是從時間線來看，或比較主副標題（語意總體結構安排）發現，《星洲日報》從一開始的「猜測」到語氣堅定，認為網傳言論為「有心人士居心叵測」，更指出「無證據證實」。除此之外，口頭反應（verbal reactions）乃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的新聞圖式，大抵重大新聞發生後，將邀請或引用先顯要的政治人物表達看法，記者可以引用他們的論述來進行「暗示」，記者也有機會客觀的闡述他方的觀點。從醫護形象及其爭議到病毒溯源，《星洲日報》多次引用中國各國大使的說辭，不排除這樣的安排與媒體自身意識形態有關（van Dijk 1988, 54）。

同樣的，《星報》針對病毒起源相關爭議的報導，都以「或」起源於武漢為主，如“U.S. report concluded COVID-19 *may* have leaked from Wuhan lab – WSJ”（The Star 2021a），但在事後聚焦和報導中國的官方回應，如“China *fires back* at Washington after it raises concerns about WHO Covid-19 report”（The Star 2021b），選用了“fires back” 和一字來駁斥該言論。本文認為，這些詞彙多有情緒及負面意涵，或可使用較中性的詞彙如不認同“disagree”，但《星報》卻選擇了非中性的字眼。如van Dijk（1988）談及，我們可以大致從詞彙的正負面性質了解記者對事情的看法。

## 報導論述摘錄二：修辭

除了語意總體結構的敘事方式，兩報在修辭的引述與關注的面向皆有不同。如《星洲日報》在病毒起源相關爭議的正面報導上都以駁斥武漢實驗室洩露病毒的說法，或反擊美國才是病毒外洩地，如引用中國外交部〈華春瑩：美國應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請世衛組織專家去溯源調查〉（星洲日報 2021d）、〈指或是美軍帶冠病到武漢 中外交部：美國欠一個解釋〉（星洲日報 2020i）及和新華社的說辭〈網傳新華社副社長文章爆料「沙斯及冠病與美國有關」〉（星洲日報 2021e）；《星報》則針對世衛（WHO）組織擬重新派員調查病毒起源一事有多則報導“China will not follow WHO’s suggested plan on 2nd phase of Covid-19 origins study: Beijing”（The Star 2021c）、“China rejects need for further WHO coronavirus origins probe”（The Star 2021d）和“China’s UN envoy calls on WHO to probe US labs as the source of the coronavirus and Covid-19”（The Star 2021e）。

另外，從新聞背景資料的選取可看出記者對事件的重視程度或看待角度，新聞所透露的主題對媒體和記者看來都具有宏觀結構層的重要含義。因此新聞話語體現了一種視角，更會體現在宏觀結構組織和暗示上（van Dijk 1988, 41）。

## 伍、結論

在全球化脈絡下，媒體不僅擔負著政治傳輸者與傳送者的角色，同時也作為國際政治領域的主要行動者。除了作為政治傳播工具，媒體也參與形塑國際關係，甚至建構特定國際政治秩序、強化／正當化特定跨國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的，媒體也必須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調整內容呈現方式來服務特定政治集團。在本研究中，新冠疫情作為全球媒

介事件，對中國形象造成巨大的風險及機會。然而，這種全球媒介事件並不能被視為單一的整體。實際上，圍繞著這起事件的是種種爭議，使媒體對事件和爭議的回應更為複雜。

本研究透過分析2019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間的《星洲日報》和《星報》再現的中國疫情報導內容（醫護形象及其爭議、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發現不同媒體對事件中的各類爭議均有不同的關注程度，甚至個別媒體對各類爭議性議題的關注與內容呈現也相當多樣。

概括而言，《星洲日報》對醫護爭議、資訊控制、病毒發源地等相關事件都較為重視，尤其犧牲的醫生李文亮醫生抵觸了中國傳統道德價值、病毒發源地爭議則被理解為一種針對中國的恥辱，因此中文媒體特別投入更多關注度。換言之，《星洲》較傾向凸顯中國官方、官媒講究社會正義及道德價值的應對態度，也引用大量的中國官方論述。而《星報》則以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而關注言論與身體自由控制等事件。

另一方面，兩家媒體在呈現資訊控制、人身自由控制、病毒起源等內容時，都傾向正向的方式呈現。然而，面對醫護爭議相關事件時，《星洲日報》比《星報》傾向採用更正面的內容呈現方式。有趣的是，本研究也發現《星洲》也以較為負面的方式呈現「人身自由控制」此一抵觸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內容，這可能與相關報導集中在疫情後期、馬來西亞醞釀解封之階段有關。在這種情況下，馬來西亞媒體對採取保守清零策略可能提出更多批判性意見。

進一步來說，馬來西亞媒體為了符合中國官方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疫情政治化，再利用文本方式傳達出符合媒體本身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兩家報紙的文章都可以套入van Dijk的論述策略分析。另外，《星洲日報》在報導正面新聞會以引用中媒通訊社為主。從中可以看出，《星洲日報》在處理負面新聞會選擇淡化或避開外媒或西方研

究，而選擇能反映中國本地民眾意見的資料。

儘管《星報》引起馬華公會政黨背景，而被質疑為「親中」媒體，但《星報》傾向於呈現與西方價值相近的態度及立場，在內容上更為強調人權普世價值和公民社會等概念。舉例而言，《星報》大抵關於醫護爭議相關事件都以「吹哨者」來呈現，也試圖讓閱聽眾明白李文亮並非如中國一開始所述的造謠者，肯定李文亮的行動。為增加民眾對相關權益剝奪的情緒，《星報》除了引用學術或調查報導，也會引述「多數人」和「網友」的論述。另外，英文媒體也關注中國網路審查制度，透過例舉中國如何對付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發表異議的人士，達到一定的警惕效果。

過去的研究或智庫分析都將《星洲日報》與《星報》視為「親中」媒體，但兩者針對中國新冠疫情的種種報導卻存在著細微的差異。本研究推測，這可能與媒體組織與中國官方的依賴程度，以及文化價值之差異程度有關。首先，《星洲日報》所屬的世華集團與中國官方及市場有緊密的經濟依賴關係，龐大的經濟利益令世華集團旗下媒體籠罩在中國因素的陰影下，無法享有更多的自主權。相對的，馬華公會儘管與中共維持友好政治關係，但卻缺乏緊密經濟依賴，且必須面對漸趨本土化的馬來西亞華人選票，因此也缺乏去控制旗下媒體的積極誘因。其次，《星洲日報》的主要中文受眾在文化取向上與中國所形構的中華文化或大中華民族主義較為親近，也影響了媒體報導的方向。《星洲日報》為了貼近馬來西亞廣大的華人市場，便在許多議題上強調這種文化親近性。然而，《星報》作為英文媒體，面對英語使用社群，它可能更為強調西方價值或態度，而非呼應中共宣導的中華民族主義。這即可解釋《星報》在一些議題上選擇呈現更多元、更強調西方人權價值的報導。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媒體不同的報導傾向是否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對中國的態度，乃至於影響馬來西亞政府對中態度的變化？媒體與閱聽

大眾的政治態度通常存在著緊密關聯，前述中共運用的多種媒體策略來形塑國外支持群眾的例子正好呼應了此一命題。不過，縱使是同一語言使用者，其文化或國族認同的差異性仍可能影響他對報導內容的反應。這意味著認同的界線並不由語言決定，一個以中文為母語的受眾，他的文化及國族認同可能是本土的，而這種模糊交織的認同界線也可能影響讀者對媒體報導內容的解讀。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關懷漸趨本土化，因此《星洲日報》呼應中共宣傳機制所打出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感牌能否取得支持，值得進一步思考。另一方面，馬華公會在2008年後開始勢微，至今已經失去重要的政治影響力。<sup>16</sup> 相較於傳統華人社群議題，讀者的政治傾向是否迫使馬華公會面對更為多元的政治訴求，繼而影響其旗下媒體的政治傾向，也是未來有待研究的議題。換言之，我們面對的是更為殊異、多元、異質的讀者社群，這些閱聽受眾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無法就單向的「媒體⇨受眾」關係來理解，受眾的政治態度可能也因其族群身份、文化認同、階級位置、教育程度所交互影響。誠然，這需要廣泛的調查資料才能作詳細的分析，但根據馬來西亞當代政治局勢發展，本文權以提出上述觀察留待未來進行研究。

最後，透過內容和批判論述分析，van Dijk的論述策略促使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傳播以什麼角度報導中國疫情新聞，或可以淡化或美化，或加入何種意識形態。我們也深知難以根治媒體特定的傾向和欲傳達的意識形態。但本文提供了兩種語言的媒體如何再現中國新聞疫情的方式，也探究他們偏好那種議題及投入的意識形態，有助於人民在閱讀相關報導或內容時，降低被特定框架或假新聞蒙蔽的機率。

本文受限於題旨及資料，無法確立中國如何在疫情期間進一步影響

---

16. 2008年馬來西亞大選，馬華公會失去半數以上的既有議席；2013年大選，馬華公會只得7個議席。一直到近期的2022年大選，馬華公會在222個國會議席中只獲得2個議席。

《星洲日報》及《星報》之內容呈現。不過，本文所探討之議題鑲嵌在中國對世界媒體廣泛影響的背景下，媒體所呈現的中國疫情形象可以激發未來學界對全球媒介事件的關注。具體而言，全球媒介事件可以成為一國重建形象的重要時刻，但形象的重建並非全面一致的，在國際媒體多元繁雜的情況下，國家實際上被建構為許多不同樣貌。縱使中國國際影響力十分強大，也難以完全主導各類國際媒體內容的生產。

## 參考文獻

### 中文

- Hamilton C. 著、江南英譯，2019，《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Hamilton C. zhu, Jiang, Nan-ying yi. 2019. Wu sheng de ru qin: zhong guo yin su zai ao zhou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Xinbei: Zuoran.
- Hamilton C. 著、梁文傑譯，2021，《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新北：左岸。Hamilton C. zhu, Liang, Wen-jie yi. 2021. Hei shou: jie chuan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ru he gai zao shi jie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 Xinbei: Zuoran.
- 新華社，2020，〈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犧牲人員被評定為首批烈士〉，[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2/content\\_5498352.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2/content_5498352.htm)。查閱時間：2022/9/10。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Hubei 14ming xinguanfeiyan yiqingfangkong yixian xishengrenyuan beipingdingwei shoupilieshi" [The 14 people who died on the front lin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new epidemic of crown pneumonia in Hubei were evaluated as the first batch of martyr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何亞非：發揮華僑傳播中華文化優勢〉，<http://www.scio.gov.cn/m/zhzc/10/Document/1437648/1437648.htm>。查閱時間：2019/12/7。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Heyafei: fahui Huaqiao chuanbozhonghuawenhua youshi" [He Yafei: Giving full play to Huaqiao's strengths in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ccessed on December 7, 2019).
- 王雅玄，2005，〈社會領域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論的重建〉，《教育研究集刊》，51(2)：67-97。Wang, Ya-Xuan. 2005. "Shehui lingyu jiaokeshu de pipan lunshu fenxi: fangfalun de chongji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 Method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2): 67-97.
- 台灣民主實驗，2021，〈馬來西亞中國影響力標準〉，<https://china-index.io/country/Malaysia>。查閱時間：2022/3/2。Doublethink Lab. 2021. "Malaixiya zhongguo yingxiangli biao zhun" [China Influence Index in Malaysia]. (Accessed on March 2, 2022).
- 朱運健，2019，〈新疆教培中心曝光 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星洲日報》，7月6日。Zhu, Yun-Jian. 2019. "Xinjiang jiaopeizhongxin puguang zhu wei wuerzu zhong rongru shehui" [Xinjia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revealed Help Uyghurs return to society]. *Sin Chew Daily* (July 6).

李美賢、闕河嘉，2018，〈臺灣「東南亞新二代」的形象建構〉，《傳播文化與政治》，7：133-174。Li, Mei-Xian, and Que, He-Jia. 2018. "Taiwan dongnanya xinerdai de xingxiang jiangou" [The Image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s Mainstream Newspapers]. *Communication, Culture & Politics* 7: 133-174.

房翠瑩，2016，〈恐懼是一種習慣：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自我審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Fang, Cui-Ying. 2016. *Kongju shi yi zhong xiguan: Malaixiya huawenbao de ziwuwoshencha [Fear is a Habit: Self-censorship of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in Malaysia]*. Taipei: MA. dis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林怡廷，2016，〈張曉卿：南洋華商的中國夢（四）〉，《端傳媒》，8月13日。Lin, Yi-Ting. 2016. "Zhangxiaoqing: Nanyang huashang de zhongguomeng (si)" [Tiong Hiew King: The China Dream of a Nanyang Merchant (IV)]. *Initium Media* (August 13).

星洲日報，2020a，〈「中防疫沒失信於民」 崔天凱贊李文亮好醫生〉，<https://www.sinchew.com.my/?p=2983336>，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a. "Zhong fangyi mei shixin yumin cuitiankai zan liwenliang hao yisheng" [People have not lost faith in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Cui Tiankai praises Li Wenliang as a good doctor.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b，〈鐘南山談李文亮病逝：他是中國的英雄〉，<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212/%E9%92%9F%E5%8D%97%E5%B1%B1%E8%B0%88%E6%9D%8E%E6%96%87%E4%BA%AE%E7%97%85%E9%80%9D%EF%BC%9A%E4%BB%96%E6%98%AF%E4%B8%AD%E5%9B%BD%E7%9A%84%E8%8B%B1%E9%9B%84/>，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b. "Zhongnanshan tan liwenliang bingshi: ta shi zhongguo de yingxiong" [Zhong Nanshan on the death of Li Wenliang after a long illness: He was a Chinese hero].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c，〈中國駐法使館：用「吹哨者」形容李文亮是在分裂中國民意〉，<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211/%E4%B8%AD%E5%9B%BD%E9%A9%BB%E6%B3%95%E4%BD%BF%E9%A6%86%EF%BC%9A%E7%94%A8%E5%90%B9%E5%93%A8%E8%80%85%E5%BD%A2%E5%AE%B9%E6%9D%8E%E6%96%87%E4%BA%AE%E6%98%AF%E5%9C%A8%E5%88%86%E8%A3%82/>，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c. "Zhongguo zhufa shiguan: yong chuishaozhe xingrong liwenliang shi zai fenlie zhongguo minyi" [Chinese Embassy in France: The use of 'whistle-blower' to describe Li Wenliang creates a rift in China's public opinion].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d，〈中駐英大使：李文亮非吹哨人 中國不是病毒起源〉，<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502/%E4%B8%AD%E9%A9%BB%E8%8B%B1%E5%A4%A7%E4%BD%BF%EF%BC%9A%E6%9D%8E%E6%96%87%E4%>

BA%AE%E9%9D%9E%E5%90%B9%E5%93%A8%E4%BA%BA%E2%80%A7-%E4%B8%AD%E5%9B%BD%E4%B8%8D%E6%98%AF%E7%97%85%E6%AF%92%E8%B5%B7%E6%BA%90/，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d. “Zhongguo zhuying dashi: liwenliang fei chuishaoren zhongguo bushi bingdu qi yuan” [Chinese Embassy in the UK: Li Wenliang is not a whistle-blower. China is not the origin of the disease].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e，〈困武漢馬男：沒澄清謠言·「中處理疫情不透明」〉，<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127/%E5%9B%B0%E6%AD%A6%E6%B1%89%E9%A9%AC%E7%94%B7%EF%BC%9A%E6%B2%A1%E6%BE%84%E6%B8%85%E8%B0%A3%E8%A8%80%C2%B7%E4%B8%AD%E5%A4%84%E7%90%86%E7%96%AB%E6%83%85%E4%B8%8D%E9%80%8F%E6%98%8E/>，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e. “Kun wuhan ma nan: mei chengqing yaoyan zhong chuli yiqing bu touming” [A Malaysian male trapped in Wuhan: Rumour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China’s 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is indeed opaque”].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f 〈武漢肺炎起因 蝙蝠傳蛇再傳人〉，<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123/%E6%AD%A6%E6%B1%89%E8%82%BA%E7%82%8E%E8%B5%B7%E5%9B%A0%C2%B7-%E7%A0%94%E7%A9%B6%E7%8C%9C%E6%B5%8B%EF%BC%9A%E8%9D%99%E8%9D%A0%E4%BC%A0%E8%9B%87%E5%86%8D%E4%BC%A0%E4%BA%BA/>，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f. “Wuhan feiyan qi yin bianfu chun she zai chuan ren” [The cause of the Pneumonia Outbreak in Wuhan initially leaped from bats to snakes and then transmitted to human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g，〈網站指武漢「P4」實驗室洩病毒 中使館斥居心叵測〉，<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127/%E7%BD%91%E7%AB%99%E6%8C%87%E6%AD%A6%E6%B1%89p4%E5%AE%9E%E9%AA%8C%E5%AE%A4%E6%B3%84%E7%97%85%E6%AF%92%C2%B7%E4%B8%AD%E4%BD%BF%E9%A6%86%E6%96%A5%E5%B1%85%E5%BF%83%E5%8F%B5%E6%B5%8B/>，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g. “Wangzhan zhi wuhan P4 shiyanshi xiebingdu zhongshiguan chi juxinboche” [Rumors COVID-19 pandemic most likely originated from a ‘P4’ lab leak that the Chinese embassy denounced].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h，〈武漢肺炎傳出陰謀論 無證據證實病毒來自實驗室〉，<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203/%E6%AD%A6%E6%B1%89%E8%82%BA%E7%82%8E%E4%BC%A0%E5%87%BA%E9%98%B4%E8%B0%8B%E8%AE%BA%E2%80%A7%E6%97%A0%E8%AF%81%E6%8D%AE%E8%AF%81%E5%AE%9E%E7%97%85%E6%AF%92%E6%9D%A5%E8%87%AA%E5%AE%9E%E9%AA%8C%E5%AE%A4/>，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h. “Wuhanfeiyan chuanchu yinmoulun wu zhengju zhengshi bingdu laizi shiyanshi” [The

rumor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re a conspiracy theory. No evidence supporting claims of the laboratory of viru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0i，〈指或是美軍帶冠病到武漢 中外交部：美國欠一個解釋〉，<https://www.sinchew.com.my/20200313/%E6%8C%87%E6%88%96%E6%98%AF%E7%BE%8E%E5%86%9B%E5%B8%A6%E5%86%A0%E7%97%85%E5%88%B0%E6%AD%A6%E6%B1%89-%C2%B7-%E4%B8%AD%E5%A4%96%E4%BA%A-4%E9%83%A8%EF%BC%9A%E7%BE%8E%E5%9B%BD%E6%AC%A0%E4%B8%80%E4%B8%AA/>，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0i. “Zhi huo shi meijun dai guanbing dao wuhan zhongwaijiaobu: meiguo qian yi ge jieshi” [It may be the US Army that brought the crown disease to Wuha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US owes an explanation.].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1a，〈傳中拒提供世衛專家原始數據「冠病起源開放假設」〉，<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213/%E4%BC%A0%E4%B8%AD%E6%8B%92%E6%8F%90%E4%BE%9B%E4%B8%96%E5%8D%AB%E4%B8%93%E5%AE%B6%E5%8E%9F%E5%A7%8B%E6%95%B0%E6%8D%AE-%E5%86%A0%E7%97%85%E8%B5%B7%E6%BA%90%E5%BC%80%E6%94%BE%E5%81%87%E8%AE%BE/>，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1a. “Chuan zhong ju tigong shiwei zhuanjia yuanshi shuju guanbing qi yuan kaifang jiashe” [Rumour has it that China refuses to provide raw data from WHO experts. “Covid-19 Origins Opening Assumption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1b，〈封城一週年 武漢恢復日常了〉，<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123/%E5%B0%81%E5%9F%8E%E4%B8%80%E5%91%A8%E5%B9%B4-%E2%80%A7-%E6%AD%A6%E6%B1%89%E6%81%A2%E5%A4%8D%E6%97%A5%E5%B8%B8%E4%BA%86/>，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1b. “Fengcheng yi zhounian wuhan hui fu richang le” [One year after lockdown, Wuhan begins to return to everyday life].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1c，〈彭博社：「清零」防疫策略或令中國數年「與世隔絕」〉，<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810/%E5%BD%AD%E5%8D%9A%E7%A4%BE%EF%BC%9A%E6%B8%85%E9%9B%B6%E9%98%B2%E7%96%AB%E7%AD%96%E7%95%A5%E6%88%96%E4%BB%A4%E4%B8%AD%E5%9B%BD%E6%95%B0%E5%B9%B4%E4%B8%8E%E4%B8%96%E9%9A%94/>，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1c. “Pengboshe: qingling fangyicelue huo ling zhongguo shunian yushigejue” [Bloomberg: ‘Zero-COVID’ Policy could lead to the ‘isolation’ of China for year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1d，〈華春瑩：美國應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請世衛組織專家去溯源調查〉，<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120/%E5%8D%8E%E6%98%A5%E8%8E%B9%EF%BC%9A%E7%BE%8E%E5%9B%BD%E5%BA%94%E5%BC>

%80%E6%94%BE%E5%BE%B7%E7%89%B9%E9%87%8C%E5%85%8B%E5%A0%A1%E5%9F%BA%E5%9C%B0%E3%80%80%E8%AF%B7%E4%B8%96%E5%8D%AB%E7%BB%84%E7%BB%87/，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1d. “Hua chun ying: meiguo ying kaifang detelikebao jidi qing shiwei zuzhi zhuanjia qu suyuan diaocha” [Hua Chunying: U.S. should invite WHO to probe Fort Detrick for the origins of coronaviru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星洲日報，2021e，〈網傳新華社副社長文章爆料「沙斯及冠病與美國有關」〉，<https://www.sinchew.com.my/20210105/%E7%BD%91%E4%BC%A0%E6%96%B0%E5%8D%8E%E7%A4%BE%E5%89%AF%E7%A4%BE%E9%95%BF%E6%96%87%E7%AB%A0%E7%88%86%E6%96%99-%E6%B2%99%E6%96%AF%E5%8F%8A%E5%86%A0%E7%97%85%E4%B8%8E%E7%BE%8E%E5%9B%BD%E6%9C%89/>，查閱時間：2022/09/15。Sin Chew Daily. 2021e. “Wang chun xinhua she fusheng zhang wenzhang baoliao shasi ji guanbing yu meiguo youguan” [Rumour has it that the article by Xinhua News Agency deputy director spilled the tea, “US-related sars and Coronavirus disease”].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22).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Ni, Yan-yuan. 2003. *Zaixian de zhengzhi: taiwan baozhi meiti dui tazhe jiangou de lunshu fenxi*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s: Nega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Other in the Popular Press]. New Taipei city: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倪炎元，2013，〈從語言中搜尋意識形態：van Dijk的分析策略及其在傳播研究上的定位〉，《新聞學研究》，114：41-78。Ni, Yan-yuan. 2013. “Cong yuyan zhong souxun yishixingtai: Van Dijk de fenxi celue ji qi zai chuanbo yanjiu shang de dingwei” [Uncovering the Hidden Ideologies of Everyday Language: van Dijk’s Analytical Strategy and its Positioning in Media Studie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4: 41-78.

倪炎元，2017，〈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42：23-57。Ni, Yan-yuan. 2017. “2014 nian taiwan tauyanghua xueyun zhong de guanfang lunshu celue” [The Offic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ward Taiwan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2014].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2: 23-57.

莊迪澎，2013，〈「虛構」的文化霸權抗衡—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道德—文化」行銷策略批判（1988—2010）〉，《新聞學研究》115：51-91。Zhuang, di-peng. 2013. “Xugou de wenhuabaquan kangheng—malaxiya xingzhouribao de daode- wenhua xingxiaocelue pipan” [The “Fictional” Counter-Hegemony-A Critique on Sin Chew Daily’s “Ethical-Cultural” Marketing Strategy (1988-2010)]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5: 51-91.

- 陳芳伶，2019，〈中共竟要求馬國媒體寫「中國包括台灣香港」？網友：「回家吧，馬馬」〉，《新頭殼》，11月15日。Chen, Fang-Ling. 2019. “Zhonggong jing yaoqiu maguo meiti xie zhongguo baokuo taiwan xianggang? Wangyou: huijia ba ma ma” [CCP tells Malaysia’s media to write, “China encompasses Taiwan and Hong Kong”? Netizens: ‘Go home, *Ma Ma*’]. Newtalk (November 15).
- 彭偉步，2008，《〈星洲日報〉研究》，吉隆坡：星洲日報。Peng, Wei-bu. 2008. *Xingzhouribao yanjiu*. [“Sin Chew Daily” Research]. Kuala Lumpur: Sin Chew Daily.
- 彭懷恩，2015，《媒介政治：當代政治傳播》。台北：風雲論壇。Peng, Huai-En. 2015. *Meijie zhengzhi: dangdai zhengzhi chuanbo* [Media Politics]. Taipei: Mega Forum LTD.
- 舒慶祥，2020，〈憶起1900年的「庚子賠款」〉，《星洲日報》，4月18日。Shu, Qing-Xiang. 2020. “Yi qi 1900 nian de gengzipeikuan” [Recalling the “Boxer Indemnity” of 1900]. Sin Chew Daily (April 18).
- 黃招勤，2011，〈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與商品化的馬來西亞華裔族群想像〉，2011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Huang, Zhao-qin. 2011. “Xingzhou meiti jituan zhixingzhuxi zhangxiaoping yu shangpinhua de malaixiya huayi zuqun xiangxiang” Executive Chairman of Sin Chew Media Corporation Berhad Tiong Hiew King and the imagine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with Commodification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Xinzhu: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黃國富，2002，〈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Huang, Guo-Fu. 2002. *Malaixiya huawen baozhi yu zuqunrentong jiangou —yi huaxiao gaozhi shijian weili*. [Malaysia’s Mandarin Newspap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Vernacular Chinese school personnel controversy’]. Taipei: M.A.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黃國富，2021，〈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下）：失望民主找錯了出口？〉，《轉角國際》，7月21日。Huang, Guo-Fu. 2021. “Dama huaren yu zhongguo de juli (xia): Shiwang minzhu zhao cuo le chukou?” [The distance between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 (below): The Disappointment of Democracy?]. udn Global (July 21).
- 黃靖惠，2011，〈對美國《時代》台灣政黨輪替報導的批判論述分析：以2000年及2008年總統選舉為例〉，《新聞學研究》，106：49-98。Huang, Jing-hui. 2011. “Dui meiguo shidai taiwan zhengdang luntai baodao de pipan lunshu fenxi: yi 2000 nian ji 2008 nian zongtong xuanju weili”.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oncerning Time Magazine's Coverage of Taiwan's Political Power Turnover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00 and 2008].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6: 49-98.
- 黃藹岑，2009，〈2008年北京奧運與中國對大國外交的互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Huang, Ai-cen. 2009. *2008 nian beijingaoyun yu zhongguo dui daguowaijiao de hudong* [*The Impacts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on China's diplomatic*]. Taipei: MA diss.,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楊堯茹，2017，〈台灣女性政治人物媒體再現的批判論述分析-以2012年及2016年總統大選報導為例〉，台北：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Yang, Yao-Ru. 2017. *Taiwan nvxing zhengzhirenwu meiti zaixian de pipan lunshu fenxi - yi 2012 nian ji 2016 nian zongtong daxuan baodao wei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ese Female Politicians: A Case Study of 2012 and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s Coverage*]. Taipei: MA dis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 楊意菁，2013，〈網路意見的新聞再現與公眾想像：「網友說」新聞的內容與論述分析〉，《中華傳播學刊》，24：119-164。Yang, Yi-jing. 2013. "Wanglu yijian de xinwen aixian yu gongzhong xiangxiang: wangyou shuo xinwen de neirong yu lun shufenxi" [News Presentation of Internet Opinion and Public Imagination: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t-User Speaking" New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119-164.
- 鄭怡世，2019，〈揭露文本的沉默性：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應用於「曹小妹事件調查報告」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9：57-103. Zheng, Yi-Shi. 2019. "Jielu wenbe de chenmoxing yi pipan lunshu fenxi fangfa yingyong yu caoxiaomei shijian diaocha baogao weil" .[ Making the Production of a Text Visible: Analyzing the Investigatory Report on "The Tragic Death of Girl Tsao" to Explore the Methodolog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TU Social Work Review* 39: 57-103.
- 鍾宇婷，2017，〈兩岸新聞報導內容樣態分析-以「旺報」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Yu-Ting Chung. 2017. "Liangan xinwe baodao neirong yangtai fenxi - yi wangbao wei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ross-strait news reporting - A Case Study of Want Daily]. Hualien: MA diss.,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顏瑞宏，2021，〈中共建政70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研究與實踐》，11：141-176。Yan, Rui-Hong. 2021. "Zhonggong jianzheng 70 zhounian yuebing huodong de guanfang lunshu celue" [The Offic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Regime Toward the Parade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s Found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 141-176.

## 二、外文

- Abbas, A. H. 2020. "Politicizing the Pandemic: A Schemata Analysis of COVID-19 News in Two Selected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emiotique juridique)* 35(3): 883-902.
- adQrate. n.d., "The Star circulation and readership" <http://adqrate.com/newspaper/details?id=32&type=1>. (Accessed on March 2, 2022)
- China Daily. 2019. "Indonesian, Malaysian journalists visit Xinjiang"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03/02/WS5c79c54fa3106c65c34ec4a0.html>. (Accessed on March 2, 2022)
- Boyle, M. and Schmierbach, M. 2015.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Getting Started as a Researcher*. New York: Routledge.
- Condor, Susan and Antaki, Charles, Niklas. 1997.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pp: 320-347.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Elmer and Rui. 2020. "Covid-19: Chinese censors kick teachers out of online classrooms for politics, profanity and smoking." <https://www.thestar.com.my/tech/tech-news/2020/02/21/covid-19-chinese-censors-kick-teachers-out-of-online-classrooms-for-politics-profanity-and-smoking>. *The Star* (February 21) (Accessed on June 15, 2022).
- Garrett, Peter and Bell, Allan. 1998. "Media and Discourse: A Critical Overview." Allan Bell and P. Garrett,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 Hirsch, P. M., Miller, P. V. and Kline, F. G. 1977.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Huang, Jaw-Nian. 2017. "The China Factor in Taiwan's Media: Outsourcing Chinese Censorship Abroad." *China Perspectives* 3: 27-36.
- Huang, Jaw-Nian. 2020. "China's influence on Taiwan's media: A model of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of Chinese censorship." Brian C. H. Fong, Jieh-min Wu, and Andrew J. Nathan. *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 pp. 205-223. New York: Routledge.
-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2019. *Chinese Malign Influence and the Corrosion of Democracy: An Assessment of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Thirteen Key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USA.
- Kadju, Fransiskus and Gusfa, Henni. 2021. "The Battle of SARA Politicization as a Threat to Virtual Public Spaces and Indonesian Cyber- Democracy (Semiotics Analysis on

-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Narrative on Twitter between The Incumbent and The Opposite.” in Suraya, Daru Asih, Rizki Briandana, Muhammad Rohmadi and Kundharu Saddhono. *MICOSS 2020: Proceedings of the 1st MICOSS Mercu Bua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MICOSS 2020, September 28-29, 2020, Jakarta, Indonesia* pp: 374-384. Jakarta: European Alliance for Innovation.
- Krippendorf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 Thousand Oak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Kriton, D. 2021. “Wuhan residents remember coronavirus ‘whistleblower’ doctor a year after his death.”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world/2021/02/06/wuhan-residents-remember-coronavirus-039whistleblower039-doctor-a-year-after-his-death>. *The Star*. (February 06) (Accessed on June 15, 2022).
- Li, Y. Chandra. Y. & Fan, Y. 2021. “Unpacking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messag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Policy & Internet*. pp. 1-22.
- Mc Nair, B.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Mc Quail, D. 201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6th ed.)*. London: SAGE.
- Molter, Vanessa and DiResta, Renee. 2020. “Pandemics & Propaganda: How Chinese State Media Creates and Propagates CCP Coronavirus Narrative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1: 1-24
- Nathan, Andrew J. 2015.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156–170.
- Qiu, L. 2021. “Fingerprints of Russian disinformation: from AIDS to fake news.”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2/us/politics/russian-disinformation-aids-fake-news.html>.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Accessed on March 2, 2022)
- Reisigl, M. &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UK: Routledge.
- Rowe. D. 2000. “Global Media Event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Presence”,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97(1): 11-21.
- Scott, Calloway. 2014. “The Ebola outbreak was political - just like every disease outbreak.” In <https://www.theverge.com/2014/12/30/7466989/the-ebola-outbreak-was-political-just-like-every-disease-outbreak>. *The Verge*. (December 30) (Accessed on March 2, 2022)
- The Star. 2020a. “Wuhan doctor dies from Covid-19; China’s first fatality in weeks.”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0/06/02/wuhan-doctor-dies-from-covid-19-china039s-first-fatality-in-weeks>. (June 02) (Accessed on June 15, 2022).

- The Star. 2020b. "Probe: Action against doctor inappropriate"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regional/2020/03/21/probe-action-against-doctor-inappropriate>. (March 21 ) (Accessed on June 15, 2022).
- The Star. 2020c. "Wuhan goes all out to cut sources of coronavirus."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regional/2020/02/07/wuhan-goes-all-out-to-cut-sources-of-coronavirus>. (February 07 ) (Accessed on June 16, 2022).
- The Star. 2021a. "U.S. report concluded COVID-19 may have leaked from Wuhan lab - WSJ".<https://www.thestar.com.my/news/world/2021/06/08/us-report-concluded-covid-19-may-have-leaked-from-wuhan-lab---wsj>. (June 08) (Accessed on June 17, 2022).
- The Star. 2021b. "China fires back at Washington after it raises concerns about WHO Covid-19 report",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02/14/china-fires-back-at-washington-after-it-raises-concerns-about-who-covid-19-report>. The Star. (February 14) (Accessed on June 17, 2022).
- The Star. 2021c. "China will not follow WHO's suggested plan on 2nd phase of Covid-19 origins study: Beijing",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07/22/china-will-not-follow-who039s-suggested-plan-on-2nd-phase-of-covid-19-origins-study-beijing>. The Star. (July 22) (Accessed on mm June 17, 2022).
- The Star. 2021d. "China rejects need for further WHO coronavirus origins probe",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08/13/china-rejects-need-for-further-who-coronavirus-origins-probe>. The Star. (August 13) (Accessed on June 19, 2022).
- The Star. 2021e. "China's UN envoy calls on WHO to probe US labs as the source of the coronavirus and Covid-19",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08/26/china039s-un-envoy-calls-on-who-to-probe-us-labs-as-the-source-of-the-coronavirus-and-covid-19>. The Star. (August26) (Accessed on June 19, 2022).
- van Dijk, T. A. 1983.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an Dijk, T.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van Dijk, T. A. 1997.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p*. 1-34. London, UK: Sage.
- van Dijk, T. A.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and H.E. Hamilto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pp*. 349-371 London: Oxford.
- Weber, Robert P. 1895. *Basic Content Analysis,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owa City, IA: SAGE Publications.

- Wodak, 201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Leung & B. V. Street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studies*. pp. 16-302. London, UK: Routledge.
- Wodak, R., & Meyer, M. 2016.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pp. 1-22. London, UK: Sage.
- Zhao, X. 2020. "How China's State Actors Create a 'Us vs US' World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on Social Medi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8(2): 452-457.
- Zhou. 2020. "How WeChat censored even neutral messages about Covid-19 in China", <https://www.thestar.com.my/tech/tech-news/2020/03/04/how-wechat-censored-even-neutral-messages-about-covid-19-in-china>. (September 15) (Accessed on June 19, 2022).
- Zhuang. 2021. "Where is the exit from China's zero tolerance on Covid-19?",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11/16/where-is-the-exit-from-chinas-zero-tolerance-on-covid-19> (September 15) (Accessed on June 19, 2022).

聯絡作者：周洳萱

聯絡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電子信箱：chewruxuan@gmail.com

收稿日期：2022/08/08

審稿通過：2022/12/22

責任編輯：陳仲暄、郭淨源、林廷勳、陳恩第、段非